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4月15日第5期 总第12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28期 教育专辑（四）

目录

【“狼奶”讨论】

任国庆 一个重要概念的论证缺失——关于“狼奶”与“不变资本”的思考

马昌海 地主的“剥削”与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狼奶”与地主

附录一：农村耕地的占有率问题（马昌海）

附录二：地租率的问题（马昌海）

附录三：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节录）（杨继绳）

【评论】

潘祛病 “红色读物”解读（二）——石头爷爷带路党：《向阳院的故事》

【述往】

李南央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下）

田小野 北京女一中文革纪事

【文摘】

金灿然 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1950 年 5 月 3 日《人民日报》）

李德凤 我初步认识了自己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1952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组训革命师生联合指挥部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天津延安中学是怎样复课闹革命的

哈尔滨市工程小学革命委员会斗私批修 复课闹革命

教育革命战讯教育部革联召开座谈会讨论教改中存在的问题

【以歌观史】

编者按 1、湖北天门民歌《想起往日苦》 2、《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

【编读往来】

1、读者谈李南央之文 2、李彤谈“狼奶”的讨论 3、编者声明

【版权声明】

【“狼奶”讨论】

一个重要概念的论证缺失

——关于“狼奶”与“不变资本”的思考

任国庆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提出“剥夺剥夺者”的口号。在《宣言》的通篇论述中，始终认定资产阶级是“剥夺者”。然而在《宣言》中并没有以逻辑的方式论证“剥夺者”之所以成为“剥夺者”。在逻辑上，这个概念是未经论证的。

直到九年以后，这个概念才在马克思的《1857 年—1858 年经济学手稿》里得到论证。《手稿》全面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些理论不仅仅被马克思本人，也被后来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们始终奉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后来《手稿》成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手稿。

“剩余价值理论”同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把资本分为两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通常，在一个成功的生产—交换过程中，资本会带来增值部分。增值部分相对于资本，被称为利润。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利润是全部资本的产物。

而“剩余价值论”不这样认为。它认为：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那部分的价值，并不会增值。因此马克思把这部分资本叫做“不变资本”。而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才是产生增值部分的源泉。因此马克思把这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

举例而言，一个资本家，投资 100 元生产某种产品。80 元钱买机器和原材料。20 元钱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结果产品卖了 120 元。以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多出来的 20 元是全部投资的 100 元钱的产物。这 100 元钱是资本家掏出来的。由它所产生的 20 元钱理所当然地归资本家所有。

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转移到产品当中去了，不会创造新价值。只有“活的劳动”才能够创造新价值。因

此，增值出来的20元钱是用于雇佣工人的20元钱产生的，也就是说增值的20元是工人劳动的产物。这新产生的价值，理所当然应当归工人所有。而历来却都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

这两种理论，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增值的20元钱，是全部资本的产物。并且承认资本家的经营活动也是产生增值的劳动。因此，20元钱归资本家所有，是合情合理的。

而马克思的理论认为，20元是工人劳动的产物，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并且否认了资本家的劳动，认为资本家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是资本家首先“剥夺”了工人的财富。因此“剥夺剥夺者”就是天经地义的。

现存的政府，法律和国家机器无疑都是维护现存社会正常运转的。如果不彻底打碎现存的社会制度，就无法改变这种人吃人的现状。

这些理论传到了中国，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

于是，工人起来革命，打倒资本家，并不是图财害命，而是把资本家早已抢去的财产重新夺回来！

于是，“打地主分田地”也并不是杀人越货。而只是把本来属于农民的土地重新夺回来！

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且还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系统”的理论基石（其实，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完整的道德系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的。他们要做最顽强的反抗和垂死的挣扎。因此屠杀地主，资本家就成为了“正义”行为。从近一个世纪的共运史看，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伴随着极其残酷的屠杀。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里，血腥镇压地主、资本家，不算残忍，不算灭绝人性。而只是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的必要手段。杀得越干净，美好理想实现的越快。

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他所描述的理想国实现之前，这个“每个人”是不包括地主、资本家的。在这个时期，地主，资本家就不属于人类的成员。

即使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地主、资本家仍然不是平等的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地主，资本家的最基本人权的剥夺，和非人道的管制和镇压，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里都是“正义”的行为。

但是今天，当我们回到问题的初始，重新审视“不变资本”这个概念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概念马克思是没有论证的。马克思只是说“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产品中去了”，但他没有论证为什么不会增值。他说“只有可变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但他也无法证明，为什么可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产品中去。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只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只有可变资本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说法，就跟说“虽然没有男人是生不出孩子的，但孩子毕竟是女人的产物”一样缺乏逻辑依据。显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把一个“假说”当作了“公理”使用，构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而构建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其实，在复杂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法论证剩余价值究竟产生于全部资本的哪一部分。这就跟无人能够证明孩子的某个部位究竟是来源于父亲，还是母亲一样。而任何人都毫不怀疑的是，缺少了哪一部分资本，生产都无法进行下去。

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一经被创造出来，一个概念燃起了人性中占有欲的烈火，激发起了人性中固有的仇富的心理；一个概念给人性中虐待欲找到了释放的理由，使得残忍变成了正义，使得作恶成为行善！一个概念释放出人性中几乎所有的邪恶！

当邪恶被冠以正义和崇高的名义之后，邪恶便会以十倍，百倍于正义的力量大行其道，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约这就是共产革命获得胜利的全部奥妙。

在“剥夺剥夺者”的口号感召下，一座座火山爆发，千百万人头落地。在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资本家，地主和富农不是被剥夺了生命，就是被剥夺了自由。对于资产阶级，《国际歌》唱到：“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然而那些资产阶级，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激烈的工业、农业或商业竞争中的成功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他们代表着先进

的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他们掌握着最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他们是一代文明的载体。因此，消灭了他们，也就消灭了那个时代的文明，切断了文明发展的脉络。当共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国家宪法，执政党党章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都是毫无例外地建立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之上的一系列价值观和方法论，对文明还能有什么指望？

当今的中国文痞横行，再也找不到曹雪芹，王国维，陈寅恪，甚至连鲁、郭、茅、巴、老、曹也再难寻得一个。因为产生他们的阶级被消灭了，这一切也都不足为奇了。

在走上改革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放弃社会主义而另寻出路的国家中，过去，他们认为不变资本不能产生价值，而今天毫无例外他们都因缺乏资本而限制了发展。

过去他们认为只有劳动力才能产生剩余价值，而今天，都毫无例外地劳动力大量过剩，而成为社会最头疼的难题。

过去他们屠杀虐待地主、资本家，而今天他们都毫无例外地缺少现代化管理人才，缺乏地主、资本家。大概这就是历史的现世现报了。

一个概念，仅仅是一个缺乏逻辑论证的概念就使得整个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动荡。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不变资本”问题上，马克思思维能力的表现跟他惯常思维能力的表现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他在论证“劳动价值论”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意思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个概念的产生，表现出马克思的高度抽象思维能力。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概念，目的不在于讨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观察马克思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什么在“劳动价值论”上大失水准。

他能够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上，把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劳动，视为无差别的劳动，从而，使得商品的“价值量”概念得以成立。但是，他对待资本的思维能力，却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抽象的程度。例如，资本在没有投入生产之前，是不分“可变”和“不变”的。因此可以说“资本是无差别的”。但是一旦投入生产，马克思便不能平等对待“无差别”的资本了。武断地把资本分成了

两个有不同功能的部分：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既然资本中的每一块钱都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或者可以购买劳动力，就是说资本本身就是“活的劳动力”的物化。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么资本也应该有一个“平均劳动力含量”的概念，来表示资本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不管是资本的哪一块钱，每一块钱都含有相等的“活的劳动力”含量。这样也就还原了资本的本质功能，从而，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也随之变为不能成立。生产过程增值的那部分价值，也就只能算是全部资本的产物了。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就不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随之全部坍塌。

不知道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宏大的理论体系”，潜意识里面的功利欲望发生作用从而降低了马克思的思维能力，还是在逻辑推论中无意识的疏忽？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马克思不是说：“人所固有我无不具有”吗？当我们把他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时，发生任何错误也都是不足为奇的了。■

【“狼奶”讨论】

地主的“剥削”与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

——“狼奶”与地主

马昌海

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剩余价值学说存在缺陷，多年以来受到多重质疑。剩余价值学说来源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否认土地、矿产、资本、知识技能、管理和制度对价值的创造作用。由于不反映资源的稀缺，该理论在实践中无法指导资源的配置，已被价值的供需决定论所取代。劳动价值论不成立，剩余价值、剥削、阶级斗争就无从谈起。

经典马克思主义假设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消灭小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小农会变成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然后在这种基础上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只有地租理论，未见土地改革的内容。《资本论》中主要论述的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并没有对打击农村地主进行系统分析与指导。土地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共之所以要大规模地均分土地？是要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不能容忍阶级分化。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剥削，主要是指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工业资本的比重很小。于是，农村地主就成了资本家的替身，成了一场农民革命必然要消灭的对象。土地剥削的话语体系就代替了所谓资本剥削，中国的“土改”是学习苏联经验，而非来自马克思。

列宁主义也只有土地国有的概念。1929年俄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展开阶级斗争，瓦解乡村传统认同，清除民间组织资源，建立严酷的官方控制体系。这套农村改造模式并不是与土改同时进行，而是和集体化同时进行。而中国地主的绝大多数是两千多年私有制下形成的比较富的农民。普通农民和平民地主之间的对立和怨恨并不很大。这与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俄国农村改造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传到了中国之后，中共就由此发动了农民对农民的流血斗争，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革命史。

占农村人口总户数 4%的小地主们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肆意掠夺、进行超经济剥削，任意将土地负担转嫁于农民？传统文本认为：由于地主富农集中占有的土地高达 70—80%，造成了广大农民的贫困化及社会矛盾激化，这是中国发生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而毛泽东 1930 年所做的《寻乌调查》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 40%，地主、农民各占 30%。¹与其 1947 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提法相互矛盾：地主、旧式富农、官僚占有大部分耕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

高王凌归纳了民国年间特别是 20 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调查统计：“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 30%—40%之间（简单平均是 36%），总之是不到 40%”。²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公田不应简单视为地主占有）。所以最少有 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 30%。因此，中国近代农村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农社会。中国土地制度的问题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多地少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

中国农村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与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小农经济体制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他们和那些极少数大规模垄断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经常会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³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一方面是很多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

¹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²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2005年7月，第5页。

³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14页。

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一般富不过三代）。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生产方式、经营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¹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一些中共领导人，十分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也知道中国的地主富农有很多是穷苦出身。许多人都说自己的祖辈是靠勤劳能干致富的。读过他们对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不少小地主是由比较精明能干、精通农业技术、勤俭节约，善于经营又赶上了好机遇的中农和富农发展而来的。当然也有一些是继承了父业的非“败家子”型地主。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进行着周期性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

从小农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土地一般会自然地逐渐向产出最大的人手里集中，他们是农业生产的投资者，设计、组织、管理、指导者。而很多贫苦农民却由于长期的战乱、天灾人祸以及各种自身因素，比如生产技能较差、不善经营、劳动力不足、家庭变故病痛等，失去了改善境遇的机会。

当然，全国很多地方都确有横行一方、罪行累累的恶霸，每个地方也都有不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苦之人。

南通大学丁弘教授指出：“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²

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发现农民并非传统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通常所说的50%的地租，其实是指土地的“主产物”，并非全部的产出。南方的“小春作物”及北方的“田头地角”，一向都是不计租收租的，“相应的地租率就大约是40%或略多一些”。同时，中国社会长期普遍存在着一种“打折文化”，“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这样算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30%左右”。由于佃户与地主千百年来博弈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抗租欠租的传统，“硬抗”、“软磨”，逃租、赖租、转佃，少交、迟交、拖欠敷衍，交“湿谷”、“瘪谷”，“压产”，各种

¹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²丁弘：《中国地主经济问题》，未刊稿，第15页。

手法层出不穷。地主最简单的应对方法就是打官司，官府对此亦常常敷衍应付，而且从清朝就开了偏袒佃户的先例。地主所受的儒家教育就是宽容，不可“为富不仁”（在一个以人伦道德为本位的传统社会，“不仁”背负的成本是相当高的），有时候也不愿开罪于人（有些佃户还是数百年来一个大家族的成员或街坊邻居，沾亲带故），有的时候一让再让，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最终搞得地主并不能随意“增租夺佃”。¹

战士“作家”高玉宝曾走遍神州大地，到处做报告学公鸡打鸣。从1952年在北京绒线胡同小学做第一场报告至2009年，先后做报告5000多场，听众500多万人次，一直到82岁才停止了这一闹剧表演。根据农学、动物生理学原理和当时农村普遍的租佃关系来看，“半夜鸡叫”都是不可能的。公鸡报时并非人工所能诱发，而是其机体内部“生物钟”作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以精确的计时器来控制时间，使之与大机器生产方式相一致，并能够计算出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确数量和利润率。在《半夜鸡叫》的故事中，通过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被描述为一个普遍性的关系。把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事活动修改为大工业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以符合“剩余价值”理论，并作为其剥削本质的证明。在争夺时间控制权的较量中，雇工们一心想杀死那只公鸡，以便终止这一奇怪的时间标志，这相当于砸碎时钟来抵御对时间的控制。

《半夜鸡叫》想要证明：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还试图通过控制时间来实现对雇工的经济剥削。周地主在此表现出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革命文艺通过虚构的手段，将大工业时代初期的时间焦虑转嫁到了农耕时代的劳作之中。

在农耕时代的劳作中，以增加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并不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它仅仅是农业生产中的特例。如果不符合农作物生长周期的自然规律，地头劳动时间的增加是徒劳的。在黑灯瞎火的田地里苗草不分，也不可能做什么农活，况且还可以在地头逃避劳动。《半夜鸡叫》中的长工们“看着空中不明的星星，走到了地头，放下锄头，打火抽了一袋烟，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如果地主要雇工付出更多的劳动，一般都是选择增加工作内容、克扣工钱或降低报酬实物的质量（如次等的或湿谷子）等做法。由他人捉刀代笔或加工改写过的小

¹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第4—6章，上海书店，2005年。

说这样写，唯一接近合理的动机，就是要使故事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解释农业劳动和乡村的时间关系，以推动中国传统乡村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属性。周扒皮家的劳动情形所激发起来的并非现代时间意识，而是阶级意识，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直接图解和强化。故事最终以暴力的方式结束，雇工们痛打了地主。革命文学的写作者以一种并不存在的时间概念，来唤醒对剩余时间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而激发人们对私有制条件下剥削制度的仇恨。

旧中国农民贫穷的原因，最直接的是战乱不休，捐税繁重以及各种天灾人祸，还有人稠地窄，产业不兴，工业化、信息化程度太低等。胡适、张元济等人也分析过民国农村衰败的原因：1、工商业极不发达，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被困在土地上；2、中国农村粗疏的主、副业无力抵抗西方经济的冲击；3、政局动乱，盘剥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¹因为第二条的缘故，很多学者注意到民国农村的衰败更甚于清代。在这种全面衰败下，暴力土改作为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模式，在短期内虽可获得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的拥护，但长期看来仍解决不了农村普遍贫困的问题，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分配环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内涵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确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将人从臣民变成现代公民。人的解放才是“反封建”的关键。

二、如何看待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

1、地主代表农村先进生产力

农村中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好把式”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其农具比较齐全，资金相对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农作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农作物品种；其农副业产量往往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其耕作方法也起了示范带头作用。

2、地主进行土地经营能解决贫雇农的就业问题

如同工商企业利润是资本的回报一样，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地主将

¹ 《民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地主》腾讯《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71期，2013-6-7。

土地出租，解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外资进入中国缓解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是一码事。

3、地主是中国传统乡绅社会的传承者

孟子曰：有恒产者，始有恒心。他要对自己的财产、家庭和声誉负责。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因为有了地主阶级的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新一代去上大学，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士绅。他们大多具有助教兴学、调解纠纷、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修桥补路、救灾赈灾、兴修水利、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社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的公益事业慈善活动，他们往往带头发起并充当捐资献物和出力的主角。当年经过现代教育进入官场、商界、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界的，大多是地主子弟。

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的主流人物。那些无意于仕途经商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乡村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仅止于县级的政府，既没有社会救济能力，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乡绅肩上。

4、地主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作家野夫认为，士绅阶层既非朝廷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更非基层民主直选，它是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一种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如何周期性动荡，王朝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在很多意义上，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如果多了一层乡镇机构，县级以下的官吏也由政府发给俸禄，将大大增加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及官吏与老百姓之间的交易成本。县级以下的“乡绅自治”，就成为中国广大农村的历史传统和特点。由乡绅、族长们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为精神支柱而订立“乡约”、“村规”、“族法”；并以宗社、公共祠堂

等作为治理场所而扬“善”惩“恶”。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主要是农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宗族。国家只能借助与宗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宗族内部，家法是大于王法的，族长的权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宗族的家规是无比严重的。家族是许多农民真正的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宗祠、祖庙是人们实际的政治中心；婚丧嫁娶是人们的大典；社戏、赛神、歌会、龙舟竞技是人们的娱乐；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则是人们最正常的生活，国家只是一个高高在上、抽象模糊的概念：“天高皇帝远”。村社公共事务的开支一般来自于村社所共有的各种“公田”（学田、会田、义庄田），“族田”（祠田、社田、祭田）。公田是一种普遍的存在，采用轮流耕作制，没有人可以从中获取特别利益。它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更具福利性质，是祭祀、抚恤孤寡弱小、救济灾荒的需要，特别是用于扶助穷苦人家的子弟上学。也正是这种制度使中国传统农村里贫富不均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旧中国的国家权力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政府任命官员只到县一级（乡镇一级开始有国家政权机关已经是清末宣统三年，真正实施也是民国了）。民间宗族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渗透的范围和程度。民间宗族在乡村的扩张延伸，减小了官家出面办事的概率，承担起暴力减压阀的作用。尽管后人常常批评宗族戕伐人性，软刀子杀人，如私设公堂、伪道德泛滥（割股疗亲、寡妇殉节等等），但难以否认的是，绕开面目狰狞贪得无厌的吏胥，乡民也可获得律法秩序的关照，这场面给王朝统治戴上了一副和善（不乏伪善）的面具。当然，政府也不是对宗族乡民听之任之，保甲制度的设计就是对柔性管辖的一种补充。保甲制在历史上究竟是否有效至今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使政府要借保甲限定乡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软性管控。结果到头来，保甲系统的控制还是纷纷落入乡绅手中，削弱了衙门吏胥的支配权。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公共安全体系慢慢平稳嫁接到了地方财富和血缘脉络之中，与乡土防御机构融合到了一起。

历朝历代比较清醒的统治者，都会在意对乡村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满人入关后，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

众多的草民，不能仅靠武力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之处，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就是对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道统的丢弃。而一个无序的、丧失了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乡绅是几千年来稳定乡村秩序和政权的中坚力量。多数比较富裕的农民，包括一些小地主，通常都是乡村里最能干的人，有文化，甚至懂得一些法理知识，知道一些应付官场的方法。一旦遇到什么事情，通常都要由他们出头与方方面面打交道。佃农、雇农只是与地主发生租赁关系，政府征税都是针对田主的，因此中小地主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容易对立。同时，政府动辄征兵、征发劳役徭役等，常常会严重影响到中小地主乃至整个宗族的利益。地主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往往会和农民站在一起，出面做农民的保护人。中国的一些小地主和富农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甚至参加革命。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乡村士绅与官僚阶层的制度纽带，乡绅子弟进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后有了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跻身于城市中上流社会，甚至在感情和观念上与农村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农村精英的流失造成了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一些豪强劣绅、恶霸、痞子开始占据底层权力，宗法互助关系逐渐式微衰落。

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在《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一文中说：“我和学生对旧中国河北农村的调查显示：村里像样的地主凤毛麟角，穷奢极侈者极少，地主家的伙食，除了家长稍好外，其他成员与普通农民区别不大。所以，村民对他们钦佩有加，认为他们都是靠起早摸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才慢慢起家的”。¹

一个10口之家占田100亩的“地主”，往往还要负担众多子女上学；养护更多的牲畜和大型农具；还要攒钱再买地，其生活消费必然要受限制，只能尽量节俭。而一个5口之家占田30亩的“自耕农”，如果家里的孩子不进城读书，两者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把前者划归为“地主”，后者划归“中农”，不过是某种政治意义上的文字表述。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那些反映土改的小说

¹（《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如《暴风骤雨》，明显是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于绝对的紧张对抗状态，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并不像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普遍地尖锐激化。

地主跟农民的关系，包括他自身的状况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周边交通环境，都会对地主的经营、对地主与农民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不是所有地主都一定是恶霸，与农民关系高度紧张；也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良善之人，知书达理。不同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都会对地主与农民关系造成影响。一般农民多数情况下往往对大地主的印象会较好，因为大地主或者不直接和他们发生关系，或者因为有其他收入，收租较轻。倒是生存条件较差的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更容易紧张些。但南北方的差异也很大，通常南方中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比较紧张，为恶者也多些。中南部地区，包括西北地区，中小地主就相对中性一点，因为宗族等关系，地主与农民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有时还较高。而北方许多地方，从山东到东北，都会发现有不少中小地主与农民关系融洽，很多中小地主自己下地，每到农忙都习惯于与雇工等在一个炕头吃饭，而且是吃好的，自己家里的女人则上不了桌，也吃不到好的。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就一定作恶多。有些农户觉得小地主反而苛刻，早早就赶着雇工下田；下了工还要给他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但“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同样也不少。

不少农村中存在着比较好的传统邻里关系和主佃关系，阶级分化的现象不是很明显。一些地方的地主、富农和自己雇佣的长工、短工或佃农，往往关系还不错，就像电视剧《闯关东》里的地主兼资本家朱开山那样。因为无论是想要收成好，还是想要少麻烦，雇主们通常都是要和被雇的农民搞好关系。他们不仅有同族接济的习惯，要照顾好同宗同姓、邻里乡亲，遇到佃户婚丧嫁娶，还出钱出力相助。¹一些南方的地主到春播秋收的农忙时节，还给雇工以额外的奖励待遇：一天给人吃五顿饭，大块猪肉，大碗米饭，再加上肥肉馅汤圆之类的小吃，有的地主太太还亲自操持。究其原因也很简单：“要想马儿跑，就要多喂草”。

20世纪三十年代，王亚南（《资本论》的最早中译者）在《中国官僚政治

¹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读往阅今》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159—160页。

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在封建社会中，对农民欺压最甚的并不是一些地主，而是官僚及整个官僚制度。相比于地租负担，对中国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更多的来自于政府，更重要的始终是国家税赋。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实质就是“官逼民反”，是此后两千余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爆发的基本模式。众所周知，政府横征暴敛尤其是无休止的徭役，常常逼迫走投无路的农民造反，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官民之间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是以国家权力、政治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权力型社会生产关系的稳定性和凝固性，是民间社会的任何经济关系都无可比拟的。

“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问题，建立公民社会，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官本位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把地主阶级当做替罪羊，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这是张冠李戴了。”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而专制体制则加强了”。¹■

附录一：

农村耕地的占有率问题

马昌海

欧洲及帝俄贵族世袭相传的封建土地制度，土地难以自由分割买卖，依附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必须世代代在同一地主的采邑中受奴役。而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贫苦人户出身的。所以中国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一、中国的地主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其数千年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

¹ 丁弘：《中国地主经济问题》，未刊稿，第15—16页。



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其土地和财富大致有三种来源：

1、祖传家业。“土改”时，继承者因拥有祖传的土地而遭殃。有些财主家出了好吃

懒做、嫖赌逍遥的后代，家产散尽，反因祸得福被划为贫农。

2、在外地做官、经商后回乡兴家置业；中国工商业不发达，“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田地是不动产，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

3、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地主。

靠欺行霸市肆意盘剥而成为地主的恶霸只是少数。

第二、法律依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契约，按章纳税，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权证，公认合法。

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对17省869县的调查数据：地主户数占7%，土地拥有量为38%；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的调查，地主户数占5%，土地拥有量为34%。这些数据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大体一致。

“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¹

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条“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周期律：王朝越到末期，土地越集中到部分地主手里，农民越没活路，于是揭竿而起。近代“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也建筑在这一周期律之上。然而考之史料，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的大趋势，并不是越来越集中。由于中国传统的析产制，经过一代一代不断的分家，如台湾学者赵冈所说：“对明清农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都同意，到了明

¹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清，大地主已经消失，田产是分散在自耕农及中小业主的手中。”¹进入民国，农村土地这种“越来越分散”的趋势仍在继续，大地主已非常之少（像刘文彩这类特殊的官僚军阀地主更少）。

人口激增导致“土地兼并”越来越难，已不具备产生大地主的土壤。一方面，地少人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农民对土地越来越珍惜，除非万不得已，轻易不愿出卖田产。另一方面，农户储蓄剩余财富的速度，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变慢，使农户越来越难以扩充田产。人口的增长是导致“兼并”越来越难、地主规模越来越小的主要原因之一。把农民的普遍贫穷归因为土地兼并，进而以“打土豪，分田地”为药方，仿佛只要“均贫富”，即可挽救农民的普遍贫穷，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误区——财富均分与普遍贫穷并不截然对立，而是可以共存的；而且，普遍贫穷往往还会促进财富均分。当人均耕地和人均耕种所得降到很低的程度，而农民又很难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呆在土地上时，土地分配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反而会越来越平均。

费孝通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²

1932年，薛暮桥以无锡礼社镇为考察对象，写了一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其结论是：“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连“中小地主”都普遍破了产，可见当时农村衰败的境况；更可见这种衰败，与地主的“兼并”没有多少关系。

根据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³

¹ 转引自《民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地主》，腾讯《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7期，2013—6—7。

²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³ 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二十一世纪》，2010年，六月号。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重要业务之一是对中国国情做细致的实证调查。1935年,“满铁”调查了华北453个村落的土地状况,其中占田千亩以上的地主只有两户,2/3村庄的最大地主占田不超过200亩。1939-1940年“满铁”还调查了江苏南部4县11村,在这些村庄里,“地主户”有173户,“佃户”只有159户,平均每户“地主”出租4.92亩地。同期南方土地的分散状况更严重,据安徽、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¹

梁漱溟也说过:“我所曾从事乡村工作之河南山东两省地方,大地主虽亦恒有,但从全局大势论之,未见集中垄断之象。特别是我留居甚久之邹平,无地之人极少。我们在邹平全县所进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国廿六年上半年将竣事,而抗战遽作,今手中无可凭之统计报告。但确实可说一句: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一另一乡村工作区情形完全相似”。²

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的J·L·Buck教授,1921至1925年间及1928至1936年间,先后主持过两次大型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7省17县2866个农家,之后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第二次调查扩展至22省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其结论是:“有些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所以,中国近代农村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农社会。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材料,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⁴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地主富农在旧中国

¹ 《民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地主》,腾讯《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71期,2013-6-7。

² 《民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地主》腾讯《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71期,2013-6-7。

³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

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的几十年间约占人口的 9.45%，占土地总数的 54.37%，其中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 3.79%，占有土地约 38.29%。¹

据太行区的统计，在 1942 年以前，地主占人口比例的 3.25%，1944 年查减（即对减租减息的复查）以前，为 2.22%，到 1945 年则仅占 1.98%。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在 1942 年以前为全部土地面积的 24.63%，1942 年以后降为 9.7%，到 1944 年查减以前为 6.37%，查减之后则落到 4.22%，用当时晋察冀边区的一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地主的土地，只剩下“一点残余”了。“地主、富农占有 80% 以上的土地，贫雇农无立锥之地与事实不符。”²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 1%，占土地 4%，多数乡没有地主。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 4 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 12.4 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 5.3 亩。宁夏平罗县 6 个区，14 个乡，10549 户，只有地主 21 户，3 个区 19 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关中地区因为种种原因，多数农村确实没有地主。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存在二三百年的历史了”。³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

找不到地主，还硬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 8% 的比例打击地主富农，自然就要伤害大量的普通农民，就会把整个村子里的关系全搞乱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1948 年 1 月 4 日函电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掌握的做法，毛泽东也就同意了。以中国之大，各地的情况错综复杂、千差万别，地主极少甚至没有地主的地区当然不会仅仅限于关中或陕北绥德清涧一隅。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还

¹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 1993 年，第 7，42 页。

² 详见李力跃：《土改研究》第十一章（未刊稿）

³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第 81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

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如皖南一家农户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其维持简单生活；东北和西北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据张闻天的调查，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 垧）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

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实际上，除了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东北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都在二三十亩以上。

据学者黄道炫看到的资料：1950 年，中共在做土改决策前在各省都组织了土地状况的调查，这个调查的规格很高，各地的省委书记直接主持参与。除了极个别省以外，绝大部分调查数据基本都是地主占田 30% 左右。

杜润生主编的《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一书中的相关图表：全国土地改革前，占人口 4.75% 的地主占有 38.26% 的耕地，占人口 4.66% 的富农占有 13.66% 的耕地，占人口 33.13% 的中农占有 30.94% 的耕地，占人口 52.37% 的贫雇农占有 14.28% 的耕地。所以，中国土地制度的问题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多地少的土地危机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

高王凌归纳民国年间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调查统计，结论是：“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 30%—40% 之间（简单平均是 36%），总之是不到 40%”。

¹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 30%。

根据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浙江、安徽、察哈尔、绥远等省“永佃制”的比重相当高。因为种种特殊契约关系的存在，地主与佃农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地主并不能始终保持对佃农的土地占有优势。在“永佃制”下，地主拥有田地的所有权，佃户拥有田地的使用权：享有永远租佃耕种地主田地的权力。这就是将传统的土地产权分割了。这是一种从中国农村底层自发产生并发育成熟

¹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第 5 页。

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和佃户都享有独立自主处置其产权的权力。土地产权被分割之后，地主和佃户在实际上都成了土地的实际占有者。这个时候的“租佃”，已经只是一种单纯的土地经营方式。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里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这句话被一些人解释成江苏吴中地区90%的土地集中在10%的地主手里。但实际情况却是，当地90%的佃农是永佃农，他们名义上是佃户，实际上却拥有其租佃土地的永久使用权。

一块田地被分割成“占有权”与“使用权”两项独立产权，晚清以来的官方虽然承认这种民间自发的产权分割，但却从未给出过价值分割的标准。其结果，“占有权”与“使用权”的价值，最终都由各自独立的市场来决定。一般来说，在自由市场上，“使用权”要比“占有权”更抢手。原因很简单：（1）“使用权”的交易手续简单，不像“占有权”交易需要走许多程序（因为政府只认地主为课税对象），只需双方签署有效契约即可；（2）佃户可以把“使用权”再次转手给“二佃户”，自己做“二地主”；（3）地主的收益是固定租，却常常因为“使用权”转手频繁，找不到“使用权”的最终所有者而收不到田租。相反，“使用权”的收益却是有保障的。其结果，往往导致“二地主”获取的地租收益，要超过“大地主”。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区别往往就因此而模糊了。¹

由于旧中国地主富农集中占有的土地高达70—80%，造成了广大农民的贫困化及社会矛盾激化，这是中国发生农民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因。温铁军通过对100年来各种农村调查的排序研究，没有验证这个论述。²首先，旧中国的土地制度以“两田制”和“两权分离”为主要制度形式。在人口膨胀而土地不可再生的条件制约下，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不可能呈集中趋势，而是逐渐分散。除了地主实际占有的土地约为40%之外，各种用于社区公共事务开支的“公田”、“族田”约为10—20%。而且正是在地租的压力下，土地使用权才自然向富农、中农等最有可能产生“剩余”的自耕农集中。于是，土地使用权基本上呈“正态分布”，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得以表现出“稳态结构”的内在机制。其次，恰恰是工业化的进程拉动了农业的商品化，使得剥削率远高于地租的工商业和金融资本有了与地主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机会，进入了高度分散而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农经济条件下

¹ 《民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地主》腾讯《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71期，2013-6-7。

²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

的农业社会。所以，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过量剥削农民，而是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过量剥夺农村而导致了农民的大量破产，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原始积累加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剥夺，从而导致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激化。■

附录二

地租率的问题

马昌海

“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¹清朝的地租不是越来越高，反而是不断下降。一般的地租额下降 20%左右。以往的说法是佃户们 70%-80%的产出被地主拿走了，而目前保存下来的明清乃至民国的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大多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 50%左右。但这个书面上的地租额，还并不等于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率。譬如：（1）收租的对象并不是田地出产的全部农产品。林则徐在《江南催耕课稻编》里说，吴地习俗，种稻谷要给地主交租，麦子作为土地上的“副产品”全归佃户。所以当地的佃农都愿意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吴地普遍实行两熟制，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这种两熟制一直保持到民国。（2）也不是所有租种的土地都需要交租。在南方许多地方，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其产出全归佃户所有。（3）地租常常是要打折扣的。明末耿橘考证，江苏常熟的收租比率不超过实际的 8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佃户抗租的悠久传统，一方面则是传统乡约的控制，如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里所说：“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以 1920-30 年代的吴地松江为例，在正常年景下，因为两熟制及其他因素的存在，“每亩租佃田地的地租率：仅以秋熟稻谷产量计，为 40%；而以全年粮食产量计，则为 32%”。²根据高王凌的研究，“相应的地租率大约是 40%或略多一些”。“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

¹ 丁弘：《中国地主经济问题》，未刊稿，第 15 页。

² 邢丙彦：《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和地租率》《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1 期。

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¹

高王凌在一次演讲中说：历史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可能有相当的区别。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说地主的一块地本来是一个佃户，现在如果给两个佃户或三个佃户，地租就要下降，亩产量就要提高。我往前推一步，清朝人口越来越多，亩产量提高，地租下降。我只能说这是历史学理论。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并行不悖，就是地租率下降，同时亩产量提高，同时还有大的地价增长。中国几百年来，主要是明末以来，地租为什么越来越少？第一，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打折文化”。遇事都好打折，有时候折扣一打再打，地租走的也是这条路；第二，佃农生活相对困难，所以存在一种“抗租有理”论，古书上多的是，常常理直气壮占点便宜；第三，贫苦农民人多势众。越是人多势众越得寸进尺，仗势欺人，叫做“农民欺负地主”，这种现象避免不了；第四，地主方面忍让。他们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就是宽容，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开罪于人，有时候一让再让，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总之，就是这四个原因形成了这个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高王凌认为，这是留有余地的做法，中国地少人多，需要给社会留出空间，这不是简单的权力大小问题，而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从反行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上层政治与下层社会，各级政府之间有意无意地上下相蒙，猫腻盛行，形成一个“二相社会”，假天下和真实世界同时并存。吴思的潜规则与我的反行为理念，背后都有这个“二相社会”的问题。所以，反行为不是一个反抗的问题，是政府角色、战略定位、管理机制怎么定位，其涵盖的面不是社会冲突这几个字可以涵盖的。²

一般而言，地租如果超过了农民收获量的50%，农民就不会再去租种这个地主的土地。从地主的角度讲，地租当然越高越好，但要有个限度，即地主要保证农户的最低生活消费量，否则就无农户来租种。事实上，土地的集中程度越高，地主就越有一种保持租赁户稳定性的倾向。所以，除了个别或短暂的情况，不管是固定租还是分成租，其地租是有个限度的，这个限度就在农户的最低消费量和生产量之间。反之，从农户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固定租或分成租，只要是在如前所讲的区间范围内，则农户就有充分投入劳动和技术、肥料的积极性，以获取最

¹ 《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2005年。

² 见2014年5月6日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历史学对经济学的挑战”。

高的产量来改善其自身的生活，或是进行积累。决定乡村土地租赁契约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农户与地主之间，而外在地取决于乡村的土地供应与劳动供应之间的关系。契约是依照乡村的“俗约”定的，对地主和农户而言都是“外在”的。一般说来，越是土地条件好的地区，地租越高。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1934年22个省区的统计数据为45%左右（未计算私下里的“打折”）。因为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如此，同时又没有在法律上强制性的地租规定，所以可以大致认定这是个市场双向自由选择、约定俗成自主协议租赁契约的价格。地租是一种寻常的经济行为，对于租佃双方都是有利的。租地耕种的人家，生活得到解决及逐渐起家的很多，因为租种他人的土地，越租越穷的却不多。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分别于1929、1930、1932年颁布过减租的法律，规定农村耕地的统一地租率为37.5%，却推行不下去。因为相对于30%的实际地租，这显然是增租了。

■

附录三

道路 理论 制度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节录）

杨继绳

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历史证明，现代股份公司和现代金融制度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金融制度还需要完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¹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评论】

“红色读物”读解（二）

——石头爷爷带路党：《向阳院的故事》

潘祛病

校外辅导员可以算作中国教育特色事物之一。建国60多年来，校外辅导员制度、责任、人员素质等随着社会政治气候不同，不断调整变化。近些年来，这种制度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步减弱。教育研究中，对近30年辅导员工作责任，制度建设的探讨比较多；对前30年辅导员工作的回顾总结，曾有唐伟先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中有过对文革前高校政治辅导员的论述和反思。但对于中共建政后前30年，初中等教育中辅导员和校外辅导员，将政党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任务延伸到中小校园之外，深入到学生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中，这种现象有待进一步梳理。

1973年出版的《向阳院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校外辅导员的形象——石头爷爷。1964年暑假，他引导孩子们提高阶级路线觉悟，揪出同院邻居中暗藏的阶级敌人，自此少年心中充满了阶级意识、敌情观念和刻骨仇恨。

校外辅导员，成员结构形形色色。他们出身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但政治面貌相同，都是中共党员；政治态度一致，都相信党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的经历相仿，都在革命大熔炉里经受过锻炼；最重要的，他们都具有一整套或经过培训，或无师自通，能够把青年人带上阶级斗争道路的工作方法。这种人遍布厂矿、农村、学校、街道社区，成为文革前党政体系下基层政府组织的得力帮手。

作为校外辅导员，小说中的石头爷爷有着一块标准的身份名牌：旧社会苦大仇深，受恶霸财主或资本家逼迫，投奔革命队伍，参加过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转业地方当工人。退休后，在家里闲不住，主动请缨给向阳院的孩子们当校外辅导员。

校外辅导员是校内政治辅导的延伸。区别在于，中小学校内辅导员属于教师正式编制，负责协助学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校外的往往只是一种责任、荣誉和个人拥护党要求进步的表达方式。前30年校外辅导员在各地地区称谓

不同，如政治思想辅导员、理论辅导员、红小兵辅导员等等，但他们的作用都是相同的。许多地区还针对校外辅导员有过各种级别形式不同的评比奖励，对先进辅导员颁发荣誉证书。这些荣誉代表党的信任，体现出一种个人价值获得特定政治氛围下社会和政府承认的自豪。当然，除了荣誉之外，对于还年轻的校外辅导员，更光明的个人发展前景应当更是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甚至会成为辅导员积极工作的主要动力。¹

文革前，校外辅导员的任务基本是使政治思想教育从学校延伸到社会，直至深入到每个学生家庭，立体化、全方位、无盲区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和阶级斗争观念占领孩子们的头脑。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党才能真正将青少年的教育牢牢抓在手上，与党预设的宏大目标紧密结合，使之落到实处。

石头爷爷这样的校外辅导员正是党化教育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通过它可以使学生的政治教育从学校延展到家庭，形成密闭无死角的链接。经过这种链接，石头爷爷将孩子们带上一条阶级斗争不归路。

1964年暑假，在石头爷爷精心安排下，向阳院四个六年级孩子到公路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三伏烈日，水壶成为上工必要装备。石头爷爷提倡艰苦朴素，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大葫芦装水。可是，有着一手雕刻桃核技艺的黑旦，上工不积极，整天低头琢磨刻他的桃核猴儿。这时，同院大地主师爷出身的胡礼斋出出进进的在向阳院里叨念些“小学生应该多学习”之类的“闲杂”；²外出卖货也会哼唱“花果山，水帘洞，金猴银猴享太平”的顺口溜，这就引起石头爷爷高度警觉。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的有关文章……石头爷爷不知读过多少遍了，但是每读一遍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当石头爷爷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述的时候，老人陷入了沉思。是啊，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要做垂死挣扎，还要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我们万万不可被敌人的假象所迷惑，要知道，一旦时机到了，那些白骨精们照例会跳出来伤人的。我们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遇到问题，石头爷爷还会习惯性地学习毛主席诗词：“‘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

¹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记忆》第86期。提到清华大学在1953年创立政治辅导员制度，从辅导员的选拔，任用到日后的个人前途发展，有非常明确的关联。文中特别提到前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没有坏学生，只有教坏的学生。”意即政治辅导员制度有负面作用。

²徐瑛：《向阳院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本文所引文字均摘自于该书，兹不赘述。

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主席诗词的力量犹如熊熊烈火在主人公心中灼烧，他仿佛化身成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由一只小小的桃核，洞穿妖魔鬼怪在蠢蠢欲动。

仅仅将自己的认识停留在学习毛泽东思想上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光辉思想武装自己，分析问题，挑起事端，进而教育群众，引导孩子，发动阶级斗争。

石头爷爷开始“琢磨这几天向阳院的人们向他絮叨的闲话，把这些闲话与向阳院的历史情况、政治情况放到一块去琢磨，越琢磨越觉得有问题。……渐渐地，石头爷爷将那乱麻般的思绪……，……都与后院那个胡老头关系起来。”

校外辅导员最不怕的就是出现问题，而且问题越多，干劲儿越足。在社会海洋里，他们就像章鱼柔软有力的臂腕上的吸盘，紧紧吸附在任意一个微小的社会组织上，任何被吸附的人都休想脱身。原来胡货郎想通过卖桃核猴儿为黑旦换一只漂亮的军用水壶。石头爷爷立即预见到，这是用金钱和投机倒把的方式拉拢腐蚀青少年的大问题。他盼望已久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终于在向阳院里出现了。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份岁月，日常生活的人情道理几无容身之地。石头爷爷代表着主流倡导的方向，他给孩子们准备的午饭，带着的水葫芦是无产阶级的；地主师爷出身的胡货郎送的汽水，帮着孩子卖桃核猴儿换零钱就注定有投机倒把的意识，剥削阶级的思想，刻意拉动腐蚀青少年的动机。

在这样的思路下，没有事端生出，反而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校外辅导员的工作方法有着基本固定的套路，这要从石头爷爷挑起阶级斗争的过程说起。他发动斗争，从不单打独斗，需要镇政府、居民委员会委员等各种社会正能量的支持。他每次开展工作之前，诸如在向阳院里议论帮扶对象、斗争对象的情况时，都会把居委会委员铁柱奶奶，或者苦孩子出身的农民洪石生等自己政治上的拥趸同盟集合在一起行动。基层群众积极分子发出靠拢政府政党的声音，一方面可以标明自己的革命性和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也起到为校外辅导员站脚助威的作用。那些有所谓落后思想的邻居，迫于压力，硬着头皮也必须站到石头爷爷一边。这样他的革命行动就更顺理成章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了。有党和政府做强大依托，石头爷爷在一个大杂院里“玉宇澄清万里埃”，当然是易如反掌。

石头爷爷开展工作条理明晰，为了教育孩子们学会阶级斗争，要预先做好基

层群众和家长的说服工作。小说中的校外辅导员工作手段独到，他启发群众时，最爱用的一招不是引导邻居放出闲言碎语，就是用诚恳的眼神启发群众说出心里话。之后，他一般会马上亮出毛主席语录或者诗词的“千钧棒”。在那种政治氛围下，石头爷爷就是政治正确的化身，哪位邻居还有胆量再吐出半个不同意见？谁都明白，从落后思想滑向阶级敌人，沦落为斗争的靶子，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距离短到可以用讥讽蔑视的眼神来测量。

在《向阳院的故事》里，校外辅导员除了吃饭睡觉，整天琢磨的就是阶级斗争这件大事。当出现桃核猴儿换水壶的事情后，石头爷爷的工作思路非常清晰。他会想：

——这对教育孩子是多么现成生动的教材呀。“只有让这些当奶奶、当妈妈的觉悟提高了，才能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子女。”石头爷爷行动的第一步，是把同院的居委会委员和孩子们的母亲召集到自己家，通过给大伙读毛主席的“金猴奋起千钧棒”，共同学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启发、说服、批评、教育，相互监督促进。他终于看到家长们已经“愚氓犹可训”——“铁柱奶奶听完，激动地说：‘他石头爷爷，你把那最后两句毛主席诗词再念一遍’”。 “这么说，你这个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也闻出什么味道来了？”……石头爷爷启发到：“你说咋着办吧？”孩儿家长们表态了：“按毛主席的指示，奋起千钧棒，打！”

看到大人们已经跃跃欲试，“打”声出口，校外辅导员心里有了底，着手第二步工作，辅导孩子们进行阶级斗争。石头爷爷“为向阳院的孩子挑选学习材料，……毛主席写的这首诗……工工整整地抄了下来，交给铁柱，让他们好好学习。”当铁柱问石头爷爷暑假里干些什么好时，校外辅导员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在铁柱的笔记本上写了两行大字：愿你作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作温室中的弱苗”。接着，就具体到鼓励小孩子向自己讲“闲话”，通过这些闲话扑捉他们不符合阶级斗争观念的思想。当孩子们具备初步的阶级斗争意识时，马上点拨他们：刻桃核猴儿换水壶，就是投机倒把，就是拉拢腐蚀，就是阶级斗争；即便在太平年景，也不能有“享太平”的思想。

经过一段时间引导，除刻猴儿的小黑旦外，其他的孩子们都被石头爷爷带上了阶级斗争这条道。山虎子、雪花开始想“小黑旦哪小黑旦，……怪不得整天价刻桃核猴儿，原来你是图赚钱……你怎么忘了你是毛泽东时代的少先队员！你刻桃核猴儿卖钱，这是什么思想！这是什么行为！”

“铁柱这时想的比他们俩多了一层。他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黑旦刻的猴儿怎么跑到胡老头手里去了呢？胡老头到底是什么人呢？说不定这个家伙跟雷锋叔叔抓到的那个磨剪刀的人一样哩！这事可不简单，得赶快回去向石头爷爷报告。”在校外辅导员的熏陶下，孩子们逐步从无意识地与辅导员说“闲话”渐渐走向积极主动汇报敌情了。

解决一个不上道儿孩子的思想问题，对于校外辅导员来说，正是本职工作。当黑旦“腰里背着一支崭新的水壶”进院后，石头爷爷对他进行政治训导攻势：“黑旦，你刻桃核玩具就是为了换水壶吧？”

石头爷爷说：“你首先要弄明白——我过去也跟你说过，雕刻匠手里的那把小刀，就是战斗的武器，武器是不能随便乱用的。”

洪石生（石头爷爷的徒弟）帮腔道：“武器握在手里，要紧的是弄清这武器应该为谁战斗、跟谁战斗。”

见黑旦还有些恍惚，辅导员索性挑明：“更严重的是，他要利用卖儿童玩具的机会，编顺口溜儿，散布和平麻痹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要我们奋起革命的千钧棒，扫除一切害人虫。胡礼斋这家伙却想让我们放下刀枪，躲到‘花果山’、‘水帘洞’——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过神日子。他暗地里磨刀霍霍，妄想变天，重新骑到人民头上。孩子们，我们能让他们这样做吗？”这时洪石生又紧跟上一句：“那刀刃上凝结着爱和恨。老爷爷手里这把刀，是斗争的武器，革命的武器！不是用来刻东西玩的。”就这样黑旦也被说服了。

终于等到货郎胡礼斋把卖桃核猴儿的钱交给黑旦妈的时刻，酝酿已久的一场批斗大会，在向阳院里开幕了。报幕的是黑旦妈，“她把那票子，猛地摔在胡礼斋脸上，愤怒地吼道：‘谁稀罕你的臭钱！滚！滚！’”石头爷爷的目标终于达到啦，他开口道：“前几年你用那些糟书烂画毒害孩子，现在又用金钱、物品腐蚀孩子”。

“狗师爷，你为啥骗人家孩子刻猴儿卖？”

“狗师爷，你要老实坦白交代”

“我们要对你展开斗争！”

这时候的“石头爷爷没有多讲话。他想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要让这些在

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们多经受锻炼，自己教育自己”

“铁柱厉声喝问道：‘毛主席号召我们奋起千钧棒，扫除一切害人虫，你为什么要人们躲到花果山，水帘洞里去过太平日子？’……孩子们捉来一只空马桶，吓唬着，要往胡货郎头上浇尿，‘……胡礼斋抱头鼠窜……大家看到胡礼斋那个狼狈相，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石头爷爷厉声喝道：‘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今天夜里写一式两份检查，明天一份交给商业合作小组，一份交给居民委员会。’”

“滚！滚！众人吼道。”故事最终的结果是胡货郎阴谋报复石头爷爷和孩子们的鬼蜮伎俩被揭穿，这个旧社会地主少爷出身，新社会只能混个货郎做做的斗争对象，最终被当做石头爷爷这剂阶级斗争药方上的一支药引子，成了要服用这副方剂的孩子们的“人血馒头”。

在人与人恶斗意识盛行的年代，少年人很难具备超越自身能力的眼界、学识和分析能力。学会这些人与人斗争的把戏自然是校外辅导员之类带路引导的结果。孩子们被动地生吞活剥，直接将斗争的思想能量转化成自己参与斗争的兴奋剂。终于在石头爷爷循循善诱下，孩子们主动侦查，汇报敌情。接着，向阳院批斗会的情景，想必经历过文革，或者对这一段历史有兴趣的人，都不会陌生。书中那种孩子举起空尿桶向胡货郎比划的动作，比起文革中街道乡村的血腥恐怖，真正文明到“请客吃饭”的地步了。

校外辅导员在中国已存在半个多世纪。¹ 百度百科上介绍：“校外辅导员区别于学校专职辅导员，一般是返聘的老教师、老同志、家长等，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校外未成年人的德育工作。”这个解释过于粗浅宽泛。德育教育本身是个很笼统的概念。政治性质不同的社会，德育包含的内容就会大相径庭。例如更早年间仁爱教育或者公民教育也属德育教育范畴，但它与强调阶级划分基础之上的爱恨情仇就根本是南辕北辙的事情。1949年后的青少年德育工作中，往往更多体现出政党政治教化的要求。这之中最被重视的是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教育。这份忠诚在不同时期，被灌之以不同要求，从1950年代比较平和的“爱祖国、爱人民”的“五爱教育”演变到1960年代学习雷锋“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¹ 笔者见到关于青少年辅导员的记录，是1950年7月22日团中央和教育部共同召开会议《关于加强教育行政部门与少年儿童队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各学校中聘请教师担任少年儿童队辅导员”的事宜。详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第43页。（该书未标注准印号及发号时间等，亦没有版权页）。何东昌的序言标明是1997年10月作，应为其序言后年份出版。

具体体现出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训育内涵。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政治洗脑，没有足够庞大的组织系统——少先队、青年团组织，没有一支忠于党、热爱领袖，思想过硬，可以被信任的辅导员队伍，可想而知会面临多大困难。

石头爷爷的行事，不禁使人想到“带路党”这个词。校外辅导员和带路党本来是风马牛的两件事，但青少年对阶级斗争的陌生感、距离感，在倡导阶级斗争纲举目张的年代，的确需要他们作为阶级斗争带路党，来引导孩子们，尽快熟悉，深入接触，甚至飞蛾扑火投身到斗争当中去，使之可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确保红色江山代有传人，直至乌托邦理想能够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中实现。尽管胡货郎只是哼唱过几句闲调儿，为邻居孩子用桃核猴儿换个水壶，就被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看起来似乎很有点儿没事找事的嫌疑。但既然当上带路党，就要有个带路的样子，没有由头，怎么把孩子们往阶级斗争这条道上引呢？

在中国，自解放初期土改到文革期间，成色参差的阶级斗争带路党，对文革大规模混乱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在文革中他们自身又遭遇到什么，拨乱反正后，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有过何许反思？更重要的是，带路党们那么卖劲儿地大干一场，或大干经年，对现实，对历史究竟有什么积极的作用或者价值？现在回过头来，过往岂止是荒诞不经。

带路党一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中阙如，但百度百科有比较生动趣味的解释：

带路党，意即敌人打进来时的当奸细“带路”的人。

该词揆（kuí）诸历史，在八国联军与满清政府开战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充当八国联军的带路党。概括而言，八国联军进攻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揆诸历史”使人明白，这是根据历史揣测而来的词汇。当然彼一时非此一时，各种道儿上，带路的含义也许根本不同。可，这又谁说得准呢？■

2015年4月3日完稿于北京

【述往】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下)

李南央

道路可选择

六十年代初，党对青少年有一条政策，谓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在北京的中学，那时大体是对的。记得共青团的章程是：三个团员可成立团小组，五个团员可建立团支部，并有权发展新团员，但新团员的审批权在学校的团总支。班里的第一名新团员一般都是由班主任选定、发展的。我们班第一个被提名、发展的团员是班上的班主席，她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有两个老婆，而且都活着，解放后这种情形可是稀少之极的。对于班主任的选择，同学们都有些意外，但因为信奉党的政策，也没有人以为班主任丧失了阶级立场。阶级立场这个词，我们那时似乎还没学到。不幸的是，这位团员候选人的恶运也自此而始，她的入团申请表，直至文革，整整两年，及至预备期失效，也未获校团委的批准。从交上申请表的那天起，她就开始了向团组织的无休无止的思想汇报，她得不断地提高对地主爷爷的认识，其实她从来就没见过他，她还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讨了两个老婆，这是何等的耻辱之事。不论她怎么汇报，也无法取得团组织的满意（这后来也包括了我）。

二十年后，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她，她告诉我，她记恨我们的班主任一辈子，她永远不会原谅她：“她干嘛选中我做第一个发展对象？！她几乎毁了我的青春。从入团预备期开始的第一天起（交上入团志愿书即视为开始预备期），我就失去了思维的自由，失去了欢乐，入团这座沉重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怎样与父亲相处，怎样与两个母亲相处，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既不伤他们，也不害自己。”我反对她入团时，可是一点儿都不能理会班主席的痛苦，我那时是实实在在不理解她怎么能既申请入团，又继续与那个有两个母亲的丑恶家庭生活在一起。我认为只有彻底离开那个家庭，才能说明她真正认识了那个地主家庭。我从来也没想过，离开了父母，她小小年纪靠什么生活？团组织，学校可是不会

给她钱的。

二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同学造成的伤害。我并不因为她只恨班主任，不恨我们而感到轻松，我无法用“那都是共产党的错”，“应该追究罪魁祸首的责任”，来化解对自己的责难。对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这样，我不同意用“平反”来对待这场风波。因为这样会使一切在其中沾了血的人，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而一了百了。解决“政治风波”中的冤案，只有通过法律的程序，由受害者本人或亲属，对犯罪人起诉。要有足够的证据，依法治罪。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听了那位同学说恨班主任一辈子，一点儿也不觉得她心胸狭窄的原因。

二十年后，我很为这位同学感到骄傲。十几年农村的熬练，夜大的苦学，使她变得坚强而成熟。她有了个幸福的家庭，一个漂亮的女儿。不过，她绝不让女儿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绝不许她当班干部，因为她自己已吃够了当干部的苦头。

我自己的入团经历却是党的政策的幸运例子。我的父亲庐山会议之后被开除了党籍，母亲随后与父亲离了婚，我们三个孩子都判给母亲抚养。母亲告诉我，因为她本人仍是革命干部，我们孩子的出身应算“革干”。但是我却十分缺乏自信。自从父亲出事后，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是纯洁的，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出身是有污点的。在班里我为人外表看上去十分冷漠，有的同学说我是“难以接近的人”。在班上我学习成绩很好，门门功课总在前三名，初一时我被选为政治课代表，这似乎比别的课代表地位更重要。那时学校已非常强调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了，同学们都认为政治生命比肉体的生命更重要。

一九六四年，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一个新的政治口号：“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所见所闻”变得十分流行起来。中学也受到了冲击。有一天的作文课，老师要求我们用这个口号写篇文章，要结合自身的人和事。将军的女儿B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全校各班讲读，因为她用了阶级斗争这一锐利武器分析了班上的一位同学。她在文章中写道：“这位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党的敌人，但是她经常口若悬河，花言巧语骗取了同学们的信任，当上了政治课代表，这是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

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当然都知道文章中所指的同学是谁。那些日子在校园里，我常常被其他班的同学指着后背，嘁嘁喳喳：“看，就是她。”我的心灵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完完全全地不明白，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欺骗了同学，

难道不是你们自己选我当的政治课代表吗？我什么时候骗你们选我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B，让她写出这么一篇狠毒的文章来。

二十年之后，那位在大街上偶然遇到B的同学告诉我，B说她现在回想起中学的许多所作所为，十分后悔，她那篇文章实际只是十分嫉妒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因为真认为我是那么个坏人。我听了此话后却绝没有释然的感觉，因为用革命的口号去报私仇在文革中已司空见惯，这种习气延续至今，愈演愈烈。正如哈佛中国问题学者麦克法夸尔先生所说：“今天（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左派再次猖狂，镇压盛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信奉马列主义，只不过令人作呕地使用思想的武器去攻击那些他们想暗中陷害，或者纯粹是垂涎于他们的职位，或者完全欲施于个人复仇的人。”他的这段评论真可谓入木三分了。话回到当时，我母亲终于发现我情绪有些不对头，追问之下，我讲了B作文的事，母亲立即去学校找校长谈话。几天后，语文老师找到我并道了歉，她说她错误地领会了党的阶级斗争观点，阶级斗争在青年学生中是不存在的，学生们都是祖国的花朵。我不知道母亲与校长都谈了些什么，反正老师似乎是挨了批评。我很快就把B作文引起的不快丢到了脑后，这件事并没有破坏我愉快的中学生活，也不曾在心灵中留下什么阴影。总的来说，我那时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子，当然我没有再被选为政治课代表，以后分别当了一年的语文课代表和物理课代表，我对这两门课有着更大的兴趣。

实际上，选B作文为范文的语文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直到文革开始，我们才知道这一点。那些年，确有一种很令人感到矛盾的现象，越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越表现得比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人更热衷于积极执行党的政策。回想起来，大概是缺乏自信心，总怕别人找自己麻烦的缘故。我记得我们三年的政治课有过三个政治老师，其中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后者是一位女性。这两位老师都十分令我们厌恶，上他们的课简直是活受罪。那位女老师有两句口头禅：“你们这些骄学生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你们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中学的三年，尽管我其他功课都是五分，就因为政治总拿三分，我一直没能获得北京教育局发的优良奖状，我真是腻味透了这两位政治老先生。

在我们班上，从来就没有人拿过政治课的五分，老师的理论是：“如果政治得了五分，就说明你们思想好得不用再改造了，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个人活

一辈子就要改造一辈子思想。”记得班上大概只有一、两个同学得过四分。可这两个人即不是团员，也不是好出身，而且其中一位劳动课一贯表现很差，平时极注重穿着打扮，在那个年代，可是够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了。真是天晓得政治课好到底是个什么标准？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位老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捶胸顿足，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发言：“我是个狗崽子，我没有改造好思想，我真心地希望红卫兵小将对我进行帮助和改造。我从心底里感到对不起红卫兵小将，我过去在课堂上侮辱过你们……。”我感到阵阵的恶心，我得承认，那时我真是觉得他们实在是“狗崽子”。尽管我现在体会到那不过是人性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使然。

我是在退队（年满十五岁，退出少年先锋队）的同一天被吸收加入共青团的，也就是在那一天得到的入团志愿书。如入团申请获得批准，团龄自添表那天算起。当我摘下了红领巾的那一瞬间，心头浮起一种莫名的凄凉，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没娘的孩子，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了。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班团支部组织委员递给了我一份志愿书，郑重地通知我班团支部已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我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虽然心里早觉得自己够了团员标准，但是总以为父亲的问题会永远将自己拒于团的大门之外。我焦急不安地等待校团委最后的审批意见。

两个月后，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学校主楼一楼大厅的大红榜上，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真正从B作文带来的羞辱中解脱出来，浑身感到无比的轻松。我真地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确实是党执行的政策，这可能因而成了我后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因为自己与这个党已经有了某种感情的缔结。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认为共产党在六十年代初还没有强调在中学生中也要互相斗争，但是有些仇恨的种子已经播种在一些学生的心中，在文革中这些恶种随着政治气候的升温像爆米花一样炸裂开来。

劳动课

遵循党培养劳动者的教导，学校每学期都安排有一定课时的劳动课。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每两周有一个半天的劳动课，同学们分成两组，分别在街道工厂和饭馆劳动，过一段时间后再对换。

我是在西直门外一个叫“西外大众饭馆”的地方干活，从家到那儿有四十五分钟的路程。上课那天，早晨四点半就要起来，必须在饭馆开门前半个小时赶到。

饭馆供应油饼、火烧、豆浆一类的大众早餐，八点之前，生意十分兴隆，有在饭馆就餐的，也有拿着大盆、小锅买一家人的早点的。我的任务是帮助大师傅炸油饼，开张之前，我们起码要炸出一百多张饼预备着，才对付得了流水般的顾客。我用右手拿一个钩子，从半米直径的油锅里往外捞炸好的油饼，然后穿进左手拿着的一个铁条上，待到积够一定数量，油也沥得差不多了，再放进身旁的一个大筐箩里。往往是油饼刚从铁条上抖下来，就被递给早已交好钱，等得不耐烦的顾客。我那时十四岁，人很瘦，在家又从不干家务劳动，这个活儿对我来说着实不轻松。我的左胳膊要使足力气才能撑住那根串满油饼的铁条，使炸好的油饼不至于再掉回翻滚的油锅，我左手的食指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是麻木没有知觉的，直到离开饭馆很久以后才渐渐缓过来。

不过我一点儿也不讨厌饭馆的劳动，认为对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以后自己上饭馆吃早点，就知道它的来之不易了。饭馆九点结束早餐供应，我帮助服务员打扫完卫生后就可以离开了。这对我是最叫劲儿的时候，因为在我们清理桌椅、板凳，清扫地面时，还有顾客在前厅就餐。我对在人前做这种服务工作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嘴上虽然从不承认，心里那时可是看不起服务行业的。我总是要把红领巾带在脖子上，以示自己不过是个上劳动课的学生，绝不是饭馆的服务员，以维护自己的脸面。等顾客走光以后，我常常看到店里的人把水掺进空了一半的醋瓶或酱油瓶，我对这种欺骗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在学校里我们知道的社会可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饭馆的领导对我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因为我劳动课那学期得了五分。

初中的最后一年，劳动课的政策变了，每学期只有一次劳动课，但是时间集中为二至三周，在北京郊区的农场或农村住宿、劳动。我们班去了长阳农场，收割水稻。三个班的学生集中住在一个大粮库里。每个人得到一张不厚的草垫，直接铺在水泥地面上当床。每天只有冷水洗脸洗脚，每人每天收割水稻的亩数都做记录并公布出来。我总是保持在最高纪录0.2亩。可农工用镰刀收割的纪录是二亩，我真想像不出他们怎么会那么棒！头两天，我的手上打满了血泡，浑身痛得睡觉都不好翻身。三天一过，就没事了。我们清晨排着整齐的队列一路歌声开到稻田，黄昏拖着疲惫的步伐，但仍一路高唱回到就寝的粮仓。田野的稻香是那么沁人心脾，农场的日出、日落是那么的辉煌美丽，我们这些住在北京城里的学生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色。在农场的生活过得真是十分愉快，我最多的一天吃过两斤米饭，刚收下的新鲜大米，香得吃了还想吃。

两个星期一晃就过去了。回到学校后，同学们都开始叫腰腿疼，看过医生，医生说是在凉湿的水泥地上睡的。幸亏我们那时都年青，在农场也仅只呆了两个星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后来在我进了一家军用汽车厂，在大型冲压机上工作，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我认识到，学校的那些劳动课没有白上，我离开校门后从未畏惧过超重的体力劳动和匮乏的物质生活。

民主

现在人们的共识是：“中国没有民主”，对此我并不完全同意。中国曾有一块小小的民主的领地，那就是中学的班级。我在中学时，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班委会，由七名成员组成：班主任、副班主任、学习委员、文艺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劳动委员，每门课程都设一名课代表，所有这些班干部都是由全班同学民主选举产生的。每年重新选举一次，先是同学们自由提名：被提的人名被写在黑板上，然后依次举手对这些人进行表决，有时被提名的人数会超过全班的半数。谁同意谁，不同意谁，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得票最多的为班主任，次之为副班主任，其余由班委会自己进行分工。如果没有足够的过半数当选者，就对得票较高者再进行二轮选举。班上的团支部委员也是在团员中民主选举产生的。

在中学，同学们都很熟悉这一套民主程序了。后来走入社会，进了工厂，就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班组长，工段长，甚至团小组长，团支部委员，都是由党组织提名，进行等额选举的。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掉进了一个黑窟窿，好朋友之间私下议论，没想到社会这么黑暗。记得有一位朋友说：“我恨透了学校的教育，在学校我们学的是生活无比的美好，前途无限的光明。老师教育我们要为人正直、诚实，努力工作，献身于革命事业。可是社会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人与人之间是这么尔虞我诈，领导以权压人，无处讲理。我的心在流血，我们是一群被人欺骗了的傻子。”他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愿意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学校单纯的、正面的教育方式给了我性格中光明的一面，使我总是在黑暗中去寻找那一点光明，在邪恶中感应良知。这种性格使我在文化大革命沉重的政治压力和一度曾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得已生存下去，而且从未消极、沉沦。没有学

校的那些愉快的生活，我大约不会活到今天。

结束语

那些毕业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中学生，在中国被称为“老三届”，他们是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下长成的一代。人们笑话我们，我们自己也常常自嘲受了“毛的童子功”。在中国，一至七岁的孩子被称为“童子”，“功”就是“中国功夫”。当一个武林高手自幼习武，人们会认为他有“童子功”，怎生了得！

“毛的童子功”在我们这“老三届”一代身上的表现是终生摆脱不了的“使命”感，——历史的重负，国家的使命，甚至对自己所在工作单位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对父母、对儿女不尽的职责。不管何时、何地，永远卸不下肩头的重担，也不管会不会因此惹人生厌。我曾经工作过的三线工厂有一千五百个这样的“老三届”，我们付出了那么艰辛的劳作去建设那座工厂，有时连续四十八小时不睡觉，我们那时只有很粗糙的伙食，常常吃不上蔬菜。我所有的高中、大学课程都是那时趴在床板上，在蜡烛光下自学成就的，工厂的宿舍里是连张课桌都没有的。当我在国内研究所工作时，曾经日复一日地用自行车驮着三十公斤重的铜材，在凌冽刺骨的寒风中骑行三十公里去作试验。现在我在美国的超级超导对撞机国家试验室工作，建成后，她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我把她当成上帝给予我的使命，全身心地去做。许许多多与我同属一代的人曾经与我有过同样的经历，现在也还像我一样忘我地工作。有些人至今还生活在狱中，就是因为他们放不下肩头那份要使自己的祖国昌盛强大的、自己加给自己的历史重任。常常有人问我们：“这么活着不太累了吗？”是的，是太累了，而对于那些献身于政治的人还有失去自由、生命的危险。在党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下成长起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以前没有人像他们那么活过，以后也不会有人再像他们这样活了。■

1993.5

（这篇文章是1993年5月，作者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中国问题研讨会之邀，为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

【述往】

北京女一中文革纪事

田小野

谨以此文祭奠生死相依的伟大爱情

与淹没在黑暗里的不屈生命！

——作者题记

—

北京市西城区的两所著名女校，师大女附中和女一中，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都只有副校长。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冤情早已大白于天下，女一中的副校长王毓真投河自尽，却鲜为人知。

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的王校长是在文革前夕从北京市教育局调入女一中的，她端庄文静，不善言辞。



的，她端庄文静，不善言辞。

在卞校长被打死的1966年的红八月，王校长也被斗被打、剃了阴阳头，受尽了污辱和折磨，但她挺过来了。转眼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王校长是1946年在北平加入中共的地

（左图：王毓真副校长全家福）

下组织的，可她的入党介绍人拒绝为她作证。众所周知，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一旦某个上级领导翻脸不认账，当事人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假党员”，百口莫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只是，2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几近严酷的审干，王校长都能过关，怎么到了文革，那位革命老同志就不认了呢？

王校长的丈夫顾传淦也是地下党的革命同志，两人曾相约“中国不解放就不结婚”。顾传淦是中共冀北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为迎接北平的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群众抢修供电设施、保护电厂。1949年2月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入城式，就是在北平的辉煌灯火的笼罩中举行的。解放后，顾传淦在北京电力系统任领导干部。

然而在1968年12月12日，这对曾经约定不解放不结婚、而今有着3个孩子的中年夫妇，久久徘徊在那个漆黑寒冷的冬夜，久久徘徊在北京西八里庄的京密引水渠的堤岸上，最终双双自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王校长的3个儿子，最大的才上初二，因为他们至今的长久的沉默，这个生死相依的悲壮爱情故事，其真实感人的细节只能与他们不屈的生命一起淹没在黑暗里了，后人谁也无法说清。只有昆德拉还在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该校青年教师傅敏的父母——著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也是双双自杀，傅敏在被关押期间也跳后窗投故宫的护城河自尽，他的头撞上了河底的一块大石头。据有关资料统计，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至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全国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数在50万以上。

文革中，女一中被揪出来的老师可不少，女老师都被剃了阴阳头，斯文扫地。每天早晨先在操场上集合，站成两排，唱牛鬼蛇神歌，接着就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劳动，平整操场、打扫厕所或是做煤球。谁上厕所需要洗手，必须说：“报告：黑帮×××要洗黑爪子。”这个×××还不能是自己的名字，他们每人都有侮辱性的称谓，王右派、马右派，语文教研组长叫常大狼，政治老师姓胡叫狐狸精，教导主任叫佟母鸡，报告时只能说：“报告：佟母鸡要洗黑爪子。”这时看守的红卫兵就会开怀大笑，叫道：“佟母鸡，佟母鸡，快给我们下个蛋。”

高三四班的班主任刘红芳老师也在此列，这个班就是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强烈要求废除高考，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的那个班。刘老师才是个二十六七岁、刚刚结婚的年青姑娘，因为出身好，当了学校的团委书记，受到学校书记张乃一的看重，干劲十足，被张乃一称做“关不住的小野马”。她作为“黑线的红人”被揪斗。红卫兵把批判刘红芳的大字报贴到了她居住的胡同里，满墙可见打了红叉的“刘黑臭”。刘老师得了精神病，在家养病，居委会老太太要通知她什么事儿，都是一边进院一边叫：“刘黑臭同志在家吗？”根本不知她叫刘红芳。

女一中文革被整的最惨的自然头号当权派，书记张乃一，她被单独扔在初中部望红小院的石灰水泥坑里，完全没有了人形，只能看见一双幽怨的发着绿光的眼睛。初中的红卫兵经常拿皮带抽她。后来张乃一最在意又最耿耿于怀的是谁打过她，打她的人有什么家庭背景，父母是干嘛的？张乃一是上将李达的夫人，

1958年从中央监委调到女一中任书记，其实她用不着费心猜测，打她的红卫兵的父母未必与李达将军有过节，全部都是她在女一中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精心培育的捧在手掌心的革命后代。女一中原校长叫杨滨，她的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淡，重教学，重人才，也只有杨滨才敢把大右派傅雷的儿子傅敏要到女一中当英语老师。但是杨滨因为与张乃一不合，调到男四中当校长去了。

中学的阶级路线，就是强调重用出身好的教师和激励出身好的学生，压制出身不好的。出身好的，学习好就是为无产阶级争了光。出身不好的会做的难题，红五类说：敌人磨刀我也要磨刀，我们也要会做。高三年级的一名烈士子女曾经受命于班主任，每周去训斥一名东江纵队的后代，要她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女一中位于天安门西北角的南长街，学校欢迎外宾的任务频繁，而且几乎都是倾巢出动。每到这时候，每间教室都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关在里面做作业，不允许走动。有个同学临时来了月经，要买卫生纸而被阻挡在校门口，她悲恸地大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还有就是入团，那时入团入党就等于取得了一张进入社会的特别通行证。女一中的青年教师胡红星在北京师范学院获得“红专大学生”的称号，因为出身不好苦苦争取了八年才入上团，而高三年级一位元帅的女儿，学习成绩糟糕还吊儿郎当，甚至穿着拖鞋到学校上课，在张乃一的关照下，她第一学期入团，第二学期入党。在党的阶级路线指引下，在一部分人时时处处被灌输原罪意识和罪恶感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特权意识和优越感越来越膨胀，1966年终于形成一个总爆发，特权学生们到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地步。

当然这前奏曲的作者不是张乃一，而是刘少奇。读《桃园经验》就知道，刘比毛更左，唯成分论，扎根串联，搬石头，还抄家，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联系到刘在文革中的不幸，真正印证了“杀其身而用其刑”的古例。

女一中文革的内容还有学生斗学生，比较激烈的部分发生在初中部的望红小院内。笔者曾从窗外看到初一四班的教室内，一个出身不好的被斗女孩弯腰把头放在课桌的位子里，她极度弯曲的背上还压了两三块砖头，天哪，初一的女孩呵。……初三五班的团支部书记许慧云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她因为说了“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这句话，被同班红卫兵带领同学围斗，从教室斗到院子里，斗着斗着就动起手来，许慧云被打得躺倒在地上，这时竟有同学拿脚去踩她

的肚子。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再没有人看见过许慧云，无论是学校校庆还是同学聚会，像人间蒸发一样，她了无踪影。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赵留柱，出身于中农家庭，莫名其妙地突然被揪斗。实际上女一中发展团员的事，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无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都是班主任老师说了算，所以赵留柱在20年后还对此感到无限的委屈。当时也有同学对她动了粗，女生要文斗也要武斗。赵留柱后来去山西农村插队，嫁给村里一个复转军人，直到她最后也没能回北京，50岁那年她突发心脏病死在山西大同。

二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并号召“要武”，第二天的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的三所男校，四中、六中、八中，与北京市新团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发起召开了批斗“黑帮”大会，批斗对象有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局长李晨等领导和四中、六中、八中的校长等基层干部。“8.19”最恶劣的是首开批斗会武斗之先例，在台上声泪俱下煽情的发言过程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批斗对象没头没脸地抽去，台上无人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教育局局长李晨的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押他的红卫兵带他到后台，用凉水冲一下，再押回前台接着跪。“8.19”批斗会是在“8.18”毛支持红卫兵的第二天，又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新的团市委牵头，所以本身就对武斗起着号召、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三天后的1966年8月22日，女一中的红卫兵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批斗校党支部书记张乃一的大会。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台上跪着张乃一，台下跪着十几个有着各种问题的老师，无一例外被站在身后的女红卫兵揪着头发、拧着胳膊。只要听到台上的抽打声，台下一排女红卫兵就抡起皮带，朝跪着的老师一通胡乱抽打，不知谁，被抽得满地打滚。

当时这十几个“牛鬼蛇神”晚上都是不能回家的，所谓关“牛棚”。有8个是女老师，她们共住一间大教室：党支部书记张乃一，副校长王毓真，副校长佟佩珍，政治老师胡筠若，团委书记刘红芳，语文老师王品端，语文老师魏景卿，美术老师樊尔萃，对这8个女老师来说，比批斗会更痛苦的事情还在第二天。

8月23日，女一中在学校操场搭台子继续批斗张乃一，天黑后，满身墨水、

几乎没有了人形的张乃一被拖进关她们八个女老师的大教室里，女红卫兵让女牛鬼蛇神往张乃一身上泼了几盆凉水，然后一个个揪着头发让她们跪在水地上。跪到晚上的12点的时候，另一伙挥舞着理发推子和剪刀的女红卫兵闯进来，不容分说，按住女老师的头，掀起头发，咔嚓咔嚓连推带剪完成了八个鬼模样的阴阳头。

尊严没有了，生命还重要吗？在4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作为女性，当年的女红卫兵能懂得女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后内心的绝望吗？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话好像是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他还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牛棚里的女老师被集体剃阴阳头这个夜晚，张乃一已被毒打折磨得奄奄一息，女红卫兵抓住她没有了鞋袜的两只青肿的脚，一路血迹斑斑把她拖到另一间单人牢房等死。学校里有个总务老师叫王吾建，是名转业军人，第二天早上他看到只剩一口气的张乃一后，对红卫兵负责人说，张乃一最后究竟有无问题要看她丈夫李达的情况。李达是开国上将，在国家体委任职，于是电话打到了国家体委，那边说，李达的问题还没定性，就这样，张乃一被王吾建等人用平板车拉到医院抢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女牛鬼蛇神住在牛棚里，她们的“床”是拼起来的三张小课桌，不但窄，长度也伸展不开腿，只能蜷缩着，有一条褥子，没有被子和枕头。睡觉的时候，她们既不脱衣也不脱鞋。8月底的一天深夜两三点钟，与女一中在一条胡同里的男六中的红卫兵把一个“女流氓”拖进了这间牛棚，他们用带铜圈的皮带拷打她，皮带抽下去，浅色的衬衣就渗出一道道血印，“女流氓”大声惨叫着。牛棚里女老师也不能幸免，她们同样被六中的男学生毒打，王毓贞校长肩胛骨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衫。在另一个深夜里，学校的一名化学男老师（右派）被推进这女牛棚里，女红卫兵用军棍把女老师睡觉的铁桌腿敲得巨响，喝令她们起来围着化学男老师跪成一圈，几名女红卫兵抡圆了带金属头的皮带狠抽男老师的后背，开始也是一条条的血印，很快后背就血肉模糊了，男老师的呻吟越来越弱，最后趴到地上一动都不能动了。

女一中的8名女牛鬼蛇神，除了张乃一是学校的书记，王毓真和佟佩珍是副校长，其他5名都是学校的普通老师，她们怎么了？政治老师胡筠若曾是女一中

的优秀学生，1952年高中毕业留校工作，担任过全校各年级的政治课同时兼任校工会主席，中共党员，因为出身不好，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异己分子”；团委书记刘红芳还不到30岁，血统工人家庭出身，是“张乃一的大红人”；语文老师王品端和魏景卿，因课上讲毛主席诗词贬低了伟大领袖，是“现行反革命”；美术老师樊尔萃年纪大，不但与世无争还患有不断摇头的风湿性舞蹈病，就是因为音体美组的周屏老师看她不顺眼，把她送进牛棚的，樊老师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租住公家的房子），罪名是“房产主”。

那时出身就是一切，出身好的体育老师周屏，出于公愤也出于私仇，公私兼顾把音体美教研组能找出点儿问题的老师挨个斗了一圈，把樊老师送进了牛棚。文革的潮流是学生斗老师，老师斗学生肯定是“人咬狗”式的奇闻，如果不是亲历很难有人相信。1966年笔者在文联大楼（笔者父母的单位，父亲被揪出）看大字报的时候，就遭遇周屏老师并被她追斗，幸亏那时年纪小跑得快，周屏老师一边喊一边带着女一中的几个红卫兵追，虽然最后没追上，然而周屏老师高昂的喊打声却至今留在笔者的恶梦里。

那是一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中学红卫兵属未成年人，学校里还有像周屏老师这样的成年人。女一中的杨姓工友，原为泥瓦工兼看传达室，文革因出身好成了劳改队的监工。劳改队从学校的东院把煤末抬过马路送到西院，运水合煤，用双手攥成一个个的煤球。在学校西头的望红小院里，到处是挂着牌子席地而坐的“牛鬼蛇神”和排列整齐、光溜溜的煤球。后来，杨监工不知为何在煤末里掺进了大量的石灰，使得劳改队的老师们双手溃烂、黄水直流，攥煤球时个个疼得龇牙咧嘴，直到今天，胡老师手指的伤疤还隐约可见。女一中的另一位出身不好的工友马铁山，则在被斗后的1966年夏天自杀身亡。

女一中的学生们一定忘不了劳改队里的老师们排成两排表演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情景，开头两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最后以“我有罪”结束，唱的时候还要求全身乱动，做卑微猥琐状，唱到最后一句时，一定要发出尖锐的嚎叫声，同时双臂后蹶，弯腰匍匐，前额抢地，这是每天必演的保留“节目”。杨监工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出身，愚昧无知没有半点文化，说话不利落是个大舌头，他就最爱看这个节目，一旦心血来潮，命令这些斯文扫地、被剃了稀奇古怪阴阳头的知识分子表演“嚎歌”是他的最大乐趣。大串联时，每天都有全国各

地的革命师生来到这所位于天安门旁、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中学参观学习，因此一天加演几场是常事，笔者远远见到过一回，还没等牛鬼蛇神们最后趴到地上将这“嚎歌”表演完，外地参观的人群就无声无息地散开了，离去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他们到北京来学习取经，但是他们看不下去了，他们不忍看。

1966年底，文革进行到大串联的后期，学校里的红卫兵大多出去串联了，牛鬼蛇神劳改队自行解散。

三

1966年底的时候，女一中有个窗口负责开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就能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大串联”，介绍信的关键内容是写明持信人的出身。黑五类出身的一般就不找这个麻烦了，不出去串联也不去学校，在家猫着。所以大串联后学校的校园空了一段时间，牛鬼蛇神劳改队也自行解散了。到了1967年初，陆续回到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也都纷纷起来组成革命造反组织，包括初期受到迫害的。千姿百态的战斗队遍地开花，许多也叫红卫兵，为了与“血统论”老红卫兵相区别，史家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主要是打派仗，大学的分成“天派”和“地派”，北京中学的分成“四三”和“四四”两派。

为了收拾一盘散沙的残局，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8年春天，解放军军训团进驻了女一中。军训团给每个班级都配备了一名现役军人当“排长”。军训团的第一项工作是从班级到学校，实现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大联合”，第二项工作是以毕业班分配的名义开展上山下乡大动员。

女一中上山下乡的潮流并不是无序，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解放军军训团和几个被“结合”的出身好的老师主持了毕业班的分配工作。首先对每个学生严格审查、区别对待，认真贯彻以家庭出身作为标尺的党的阶级路线。就拿毕业班初三二来说，初三二班有学生45人，出身于红五类的15名（包括两名没有被吸收进“血统论”红卫兵、确实出身于底层劳动人民家庭的），其中有3人分配到制造坦克装甲车的618军工厂，1人分配到国营棉纺厂，1人分配到手工业管理局系统下属的街道小工厂，1人分配到新华印刷厂，1人分配当小学老师，4人通过后门关系参军；当知青的4人，占26.6%；非红五类30人，有3人分配到北京手工业管理局

下属的街道小工厂，27人去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和云南当知青，占90%。

这个班的统计表明，在个人家庭出身比天大的文革时代，红五类出身的比例占中学生的33%，非红五类占67%，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红五类有26.6%当知青，非红五类则有90%当知青。从北京城里的中学生到知青，这是一支即将启程去历尽苦难的大军，她们显然无暇它顾了，甚至都不再回望一眼曾经引以为自豪、而今支离破碎的母校。

然而学校里的文革并没有因为这支学生大军的准备撤离而停滞，1968年春天，又一场旷日持久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由军宣队、工宣队发动群众，对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进行大清查，女一中再次揪出了几名老师，对他们每个人都设立了专案组立案审查，而且一揪出来就失去了自由，不得回家，单独关押，日夜监视，关押时间长达九个多月。

副校长王毓真，罪名是假党员；物理老师王肃，二类右派；物理老师张森，议论过江青，祖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作相；语文老师冯积善，议论过江青，祖父解放前是前门瑞蚨祥绸布店的老板；英语老师傅敏，其父傅雷是大右派，其兄傅聪叛国，其父母抗拒文革双双自杀身亡；史地老师房峻宜，印尼华侨；政治老师胡筠若，她的罪名不好定，在女一中读了六年，高中毕业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土生土长，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受到迫害，大家有目共睹，这次是根据她同一战斗队的“战友”揭发出她私下说的两句话来给她定罪的：“白色恐怖的八月”——反文革，“军队是带枪的工作组（那时“工作组”已经是坏词儿了）”——反军。

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来的“坏人”大致分两类，一类因言获罪诸如胡筠若老师，另一类由既定出身成份获罪诸如傅敏老师。傅敏老师是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青年书生，名牌大学的外语高材生，为人不尚心计，更不善言谈，无法因言定罪。兄叛国，他必定里通外国；父母自杀，他必定仇视文化大革命。文革定罪的形象空间往往是没有限量的大，比如房峻宜老师，邻居反映他家在晚饭的时间传出筷子敲碗的有节奏的声响，这被疑为发出通敌暗号，是里通外国的特务行径。房老师是华侨，父辈在国外还是华侨界的上层人士。

1968年春天开始的单独关押一直延续到1969年，几位老师只有王毓真副校长

没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季，1968年12月底的一个深夜，她从关押的小屋偷跑回家（锁是怎么弄开的至今是个谜），找到她的丈夫，一个电力系统的干部，俩人一起来到京密水渠的堤坝上，双双自沉，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老三届已经或即将离校，1968年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主力军既不是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也不是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是是军训团领导的学校教工和1968年从周边小学入校的六九届学生。女一中不再是女校了，男女合校，改名一六一中学。女一中的前身是1913年建立的京师第一女子中学，当年革命先驱李大钊从北洋军阀手中为第一女中争得中南海旁花神殿的校址，那是男人发现女人的价值，也是女人寻觅自身存在意义的时代。京师第一女子中学后改为北平市市立第一女子中学。1913——1968，经过55年的嬗变，北京女一中出了男生，文革认为女校是封、资、修的产物，要砸烂。

六九届新生入校后，每到上课铃声响过，自有几名班干部从牛棚把这几名老师分别押往各班教室，在口号声中被推搡着站到讲台上，低头弯腰，两只胳膊往后撅，“喷气式”要做得到位而且要从头坚持到批斗会结束，新生们一个个站起来念他们手中千篇一律的发言稿，由于文化程度低，往往连批斗对象的名字都读不准确，甚至三个字要读错两个。对这些小学都没毕业的孩子们来说，开这样的批斗会纯粹是为了应付成年人，军训团和老师。他们在小学就已经司空见惯这种场面，那时还可以武斗，现在不允许武斗了，他们也愈发弄不清这一个个撅着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这样的批斗会在5月份开头的时候几乎天天有，等各班都轮过一两遍后就渐渐少了，到了1968年的7月就完全停了，这几个老师，作为新生入学阶级斗争教育的活靶子，每人平均撅了三四十场。

新生对“坏蛋”残存的兴趣不表现在对他们来说过于深奥的批斗会上，他们喜欢把脸贴在单人牢房的玻璃窗上，冲着关在里面的“老师”龇牙咧嘴扮鬼脸，或者通过门上方斜开着的窗户往屋里扔砖头和石块，还有更加勇敢的拿了长竹竿，踮起脚从上方伸进去捅“坏蛋”取乐。配合学校专案组，有几名男生组成了看管单人牢房的“保卫组”，他们手里掌管着钥匙，被监管的老师上厕所要经过他们的允许，打开门放出去。在这个极其简单的开锁的动作上，这些男孩“看守”也竟然还有人性善恶的高低之分！而胡筠若老师，她在自己那段受苦受难的灰暗记忆里，竟然还能感受并发掘出一点点的亮色！下面全文附上胡筠若老师1998

年4月21日发表在《北京晚报》文艺副刊《记住一个人》栏目的一篇短文：

1968年，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期间，曾和几名学校的干部教师被关押在学生宿舍的“牛棚”里，为防止我们串联，每人都单独锁在一间小房中。还设立一个保卫组，派五六名男生看管我们，保卫组的组长叫叶五一，同学都叫他叶六。

回想那时，我的神经好像早已麻木，对诸如受冻挨饿、听训受辱之类已无多大反应，只有一件事觉得实在难过，就是不让上厕所。当你眼巴巴盼着“看守”走过你的窗前，赶紧说声“报告！上厕所”！你却总是听到“等会儿再说”的答复，而且之后就不见了看守的身影，于是你就得再等人、再报告、再申请上厕所……那种焦灼无奈，真是度分钟如年啊。

可是，如果赶上叶六值班，情形就不一样了，他听到有人喊报告，几乎回回都一次批准，而且还会马上用他手中的钥匙给你开锁放行，当时保卫组里最让我们发怵的是一个外号叫“四眼儿”的男生，他要么根本不来巡视，要么偏不准你上厕所，还常提个棍子挨门敲打，吼着叫你“坦白交代”。但四眼儿最服叶六，只要组长在，一切就都好办。一次，校医允许我去外面的医院看病，碰上四眼儿值班，我正心里嘀咕，叶六来了，他仔细看了医生开的假条，咬着嘴唇寻思了半晌说：“可以批准你，但要知道，让你看病是为了你好好交代问题”。我点头含泪离开“牛棚”，从这孩子给予我的短暂自由中，我似乎享受到一次人的待遇。

在和“保卫组”学生的相处中，看到有些孩子这么小就学会了以斗人为乐。接受着这种戕害灵魂的政治训练，心里真为他们悲哀，因为这些都会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积淀下非人道的兽性。

老实说，就是对四眼儿这样的学生，我也恨不起来，他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这些本该全心读书、快乐成长的少年介入了这场如此复杂、颠倒一切的运动，我们怎么能对他们求全责备呢？不过，当你遇到像叶六这样心地善良、比他的同龄人少了点任性的少年，又怎么能不感觉在你灰暗的日子里多了一份光明？

从那时起到如今，30年的风风雨雨，我忘记了许许多多，而叶六这个少年的美好形象却一直珍藏在心。我相信人事有缘，我企盼着和叶六的重逢。■

本文选自田小野的博客

【文摘】

现在各地中学地理教本大半是旧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各家私营书店所出版的。过去老解放区内虽出过几种中学地理教本，但分量太少，内容也与全国解放后的形势不很符合，不再适用了。因此，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去年秋天，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在今天春天，提出供各方参考选用的教科书书目时，在中学地理科目中，就列入了商务、开明的几种本子。但是事实上，这几种本子中虽然有在解放后由出版者自行修订过的，却仍旧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重大的缺点。在最近重新检查之后，出版总署编审局认为过去草率地介绍这几种教科书，只把书中所含的错误扼要地写在“审读意见书”里，供教育行政当局参考，没有认真的加以研究分析，将结果公之于众，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能用没有其它较好的本子或其它理由来解释。我们应该承认，这种错误表示我们在工作上还缺乏足够的认真严肃性，没有把地理科的教学看做一个重要的思想工作。因此，我们决定由金灿然同志写成这篇文章交“图书评论”发表，作为我们的工作检讨，希望各地采用这三种地理教本或采用其它旧地理教本的教师，在教学时注意这篇文章中所批评的地理观点，批判地使用旧教本。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

1950年5月3日

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

金灿然

地理科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利武器。在地理教学中，可以使学生认识我国人民的伟大与资源的丰富；可以使学生认识我国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成果，从而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观念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信心；可以使学生从世界两大阵营的斗争中，认识帝国主义的凶恶和外强中干，认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及其物质力量，从而培养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过去重视得很不够。这从我们选择了以下三种地理课

本可以看出。现在就把那三种中学地理教本，分别在几个政治思想观点上加以分析和批判。那三种教本是：一、王成组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复兴高中本国地理》（1949年12月改编本），田世英编的《开明新编本国地理》（1950年2月二、四册修订本），韦息余编的《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1949年8月平一版本）。这三种教本，虽然本来是在解放以前写的，但是作者和出版者没有根据新中国的国策与立国精神，将自己的旧出版物加以必要的检查修改，这就表示，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是不够的。

一、关于两个阵营

全世界的国家已经划分成极其明显的，丝毫不容混淆的两个阵营，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另一方面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在世界地理的教学中，必须把这两个阵营分开，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世界各个国家并列起来，一国一国的叙述他们的地势、气候、产业等等，更不能把世界的资源和物产混合起来，无立场的加以说明和比较。

在《开明新初级外国地理》中，看不出这种分明的界限。第一，在目次上就没有显出两大阵营的色彩。在欧罗马洲一编中，把欧洲分为东欧、北欧、中欧、南欧、西欧五章，这种分章的办法除了表示地区的概念以外，还有什么意义？第二，没有介绍美帝国主义的真实情况。对于它的产业（113页），只说这个占世界第一位，那个占世界第二位，这个丰富，那个很盛，没有说明这些产业到底握在谁的手里，他们拿来做什么用途，也没有说明这些占第一位、第二位的已经日渐衰落，经济危机袭来的迹象却日益增多。在叙述到它的政治时（114页），只说白人“已成为美洲的主人”，可没有说明美国到底在实行着一种什么政治，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特别错误的，96页上说：“英法两国与美国为今世民主政治的三个先进国家。”试问，所谓“今世民主政治”是什么性质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在现在看来还是“先进”的吗？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内，就连这种民主政治到底还保留着多少呢？书中对于美国这个纸老虎的实力在若干处也做了片面的夸大的估计，如11页强调了原子弹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时的作用，115页强调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等。第三，对于苏联还有若干歪曲的叙述。18页说：“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废除帝制，成立苏联。”这儿既没

有说明苏联革命的过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也没有说明它的革命的性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只说了个“废除帝制,建立苏联”,这是不合历史真实情况的。78页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国土“为德苏所瓜分”,认为苏联拿了波兰的领土,这显然是抄袭了帝国主义的谰言。苏联在波兰取回的一部分领土,本来是波兰的反动统治者从苏联侵占去的。第四,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加以适当的叙述,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从仆法、意、南也没有适当的解剖。如87页说:“意大利解放以后,废除军主政体,改建共和国”;88页说:“1945年举行大选,宣布南斯拉夫为联邦人民共和国”;97页说法国“1946年制订新宪法,第四共和国正式成立”。第五,在许多地方,把苏联与英美扭在一起叙述,混淆了敌友界线。78页说德国“国境在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分区长期占领中”,没有分清两种占领的性质。第八编综述中,把世界各国的农产、动力资源、金属矿产做了平面的罗列,分别不出哪些是掌握在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哪些是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手里。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本书是在1947年12月问世的,哪时的国际国内情况并不是现在的样子,但是我们认为,即令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作者能多找些进步的书籍看一看,有些错误也可以避免。尤其不能原谅的是,1949年8月印行的本子,依然原样不动的保留了上述的政治上的错误。

二、关于中苏友好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斩钉截铁的指出来:“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中国人民必须倒向苏联一边,已是昭如日月的真理。在我们的地理教学中,必须加强学生对苏联的认识,培养他们对苏联友好的思想与感情,任何有悖于这个宗旨的言论都是不应该有的。

但是,在我们所介绍的地理教本中,违反既定国策的反苏言论依然存在。这在王成组编的《复兴高中本国地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本书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了明显的反苏观点:

第一,关于东北。上册13页在叙述关于旅顺口大连的中苏协定时,诬蔑苏联侵占了中国的权利,并且说“苏联在东北的势力大为扩张”。在15页的习题举例

中，又发问道：“我国现今在东北的权益有何缺陷？”下册53页中更露骨的说：“东北地带突出在国境的东北部，东北两边以前被日、苏两国属地包围，一切发展，受外力的影响特别深刻。现今日本的势力虽则消灭，苏联的势力更其扩张。”在上册165及168页，关于中苏共管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也在“算是”“但是”等字眼之后，对苏联表现不友好的精神。历史事实已经无可置辩的证明，1945年所定的中苏友好条约及其它协定，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及当时国民党反动集团在中国的统治，对于中苏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苏联政府根据同盟条约，直接出兵援助中国人民，在东北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并根据协定在东北发挥了监视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作用。而在东北的各项建设中，苏联政府又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伟大的帮助。这一切，凭什么逻辑可以叫做“势力扩张”呢？凭什么逻辑可以把我们的敌人与我们的朋友并列起来，统称“外力的影响”呢？

第二，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上册第2页中，把中苏友好协定中，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叫做“不幸”。同册81页中，将外蒙与台湾并列起来说明“台湾收复而外蒙独立，恐怕得不偿失。”同册175页，更极尽曲解历史之能事，说：“外蒙”独立运动的起源，既不是纯乎出于当地居民的自动；独立之后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不能完全自立。这种情形，自然不利于我国。何况在国名并不以外蒙为限，边界又缺乏自然的屏障，而沿着新边界又不容易建立坚固的国防？”下册110至于116页“漠北草原区域”一章中，除了完全否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性外，完全歪曲的说，这个“俄人所开采”，那个“完全落到俄人手中”，对于唐努乌梁海区域，更信口开河地说，“苏联在这里已经俨然取得了我国原有的地位。”大家知道，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外蒙人民在苏联的帮助与影响之下，赶走了外国的侵略者，推翻了本民族的压迫者，较中国其它各地的人民与民族，提早二十余年走上了解放的道路，建立了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以后又在苏联的友好帮助之下，展开了建设工作。自1927年至1947年工业产品的价值增加了一百倍以上，单在1940年至1948年，养畜业产品生产额就增加了一倍，而在革命后的二十五年间，耕地面积就增加了170余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25周年纪念时，该国总理乔巴山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不可战胜的列宁斯大林学说，对于蒙古人民开辟了自由与幸福的光明道路，因而我国人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25年间，在克服封建残余和发展本国经济与文化方面，达成了巨大的成就。”还必须补充说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协助中国人民在击败帝国主义中，也起了光辉的作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是经过1945年的公民投票自行决定的。我们正应该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而庆幸，为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欢呼，任何歪曲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真相，并借此而做的反苏反蒙古的宣传，都应该遭到严正的反击。

三、关于民族平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我们的地理教学中，应该根据这个精神培养学生对少数民族的正确认识，消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灌输在他们思想中的大民族主义的残毒，养成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思想观点。

在《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修订本中，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加以足够的注意。在涉及少数民族中的各节中，对于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对于他们的经济政治制度，缺乏明白而正确的叙述。而且在若干地方，沿袭了大汉族主义的口吻，对少数民族加上一些轻蔑的词句，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光辉的历史，他们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都尽了一份应尽的责任，他们依靠了自己的努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繁荣滋长，向自然及社会的敌人做了英勇的斗争。他们的文化落后，生活困苦，是过去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汉族及本族内的封建官僚统治者所造成的。以“强悍”或“温和”来判定一个民族的特点，正是汉族统治者根据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少数民族中所引起的表面反应而得来的错误结论。此外，应该按照共同纲领第五十一条及五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少数民族的正确政策，说明是实行区域自治和让少数民族在一定的政权机构中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并帮助他们“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四、关于地理环境与人口问题

所有旧的地理教本都摆脱不了地理决定论与人口论的影响。这些教本中往往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来看地理环境与人口发展，把它们看成绝对的与具有决

定性的。他们不了解，地理环境虽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他们更不了解，人口的多少虽然给社会发展以某种影响，但那种影响是随着社会制度不同而不同的，每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它自己的人口生长的规律。

《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复兴高中本国地理》，都很清晰地看出地理决定论与人口论的色彩。

首先说地理决定论，开明第四册在陕西省一节中，有一段以“自然环境不同对居民的影响”为标题的译文，在这个标题下，叙述了农业、矿产、工商业、交通、房屋、灾荒、人口等等问题，也就是说，作者用自然环境的影响来说明了全部陕西省的经济问题。这种说明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它不能够说明以下一连串的问题：同样的一个陕北高原，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下，一块“十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的荒旱地区可以一变而走向丰农足食；同样的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为什么在反动的国民党统治之下，会闹得棉麦减产，水利失修；同样的一个陕西省，为什么一百年前只有旧式的交通工具及手工业生产，而近百年来却发展了新式交通工具与机器生产，虽然这种发展在过去曾受到很大的限制。《复兴》上册178页、180页“水旱灾患”一节中，对于华北水旱灾荒的产生，只从自然条件加以解释，没有从对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所加于农民的危害，以及在他们统治下所必然发生的水利失修、耕种失时等等社会等原因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它的解释也是片面的，失掉了应有的教育意义。该书中册121页，对于上海繁荣发达的原因，只用“位置冲要”四个字来加以解释，这就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地方，在一百年前还是一个荒僻的渔村，而在鸦片战争之后，却突然“位置冲要”起来，“繁荣的程度远胜其它各大城市。”类似以上的错误解释还有很多，这儿不在一一列举了。

其次说人口论。对于像东北、西北及西南的移民，两书都是单纯地用人口过剩来解释。《复兴》上册120页说：“人口稠密的各省，大多已发生人口过剩的现象。”121页说山东、河北已“难以容纳它们天然继续增加的人口。”122页说向西北移民给“河北以及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过剩人口另有一条出路”，同页又说“南方各省的人口密度，大部分也已经达到饱满的地步。”《开明》第二册45至46页，也说向东北移民，“可以解决华北的人口过剩问题。”一二百年以

来，华北、华东、华中、华中南地区地人口确实在向东北、西北、西南以及海外移殖。但这种移殖是否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过剩”呢？不是的，那是表现了在封建的及半殖民半封建的剥削之下，劳动人民失掉了生产手段，或者虽尚保有少量生产手段，但由于过分的剥削而不能取得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料现象。所谓“人口过剩”，是封建剥削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一旦把这种剥削与侵略的锁链挣脱，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开始的时候，所谓“人口过剩”就不复存在了。

五、关于经济建设

我们的地理教学应该为生产建设服务。本国教本中，应该把我国丰富的物质资源及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从事生产建设，加以恰当而生动的叙述，借以提高学生对生产建设的认识，并鼓励他们的建设热忱。我们所介绍的这两种本国地理课本中，在这方面都做了一些，但是都做得不够，而且有错误。

《复兴》上册中，关于我国重要矿藏、农产、工业的叙述，在若干处都没有立场的强调了缺点。关于煤藏，说：“分布之广，未必就足以表明储量之大”（79页），对于金、银、铜的矿藏，竭力形容其贫乏（81页），对于石油及硫磺，也说：储量“特别稀少”（81页）。特别不应该的是，用了与美帝国主义的资源对比的办法，说我们的煤藏只抵其几分之几，铁藏只抵其几十分之几。就现在已知的材料，我国并不是一个矿藏贫乏的国家，而且将来生产建设大规模的展开以后，新的地方资源将陆续发现。在地理教本中，我们使用材料应该审慎，应该采取适当的保留态度，在说明时更应该有立场。关于农业，同书149页说：“我国号称以农立国，而现实农业的情形，与他国不同之点，就是消耗人工特别多，而一般工作的效率特别低。”（149页）关于工业又只批评了落后，并没有说出落后的原因（151页）。丢开历史条件与社会制度，片面的、消极的批评我国的贫乏与落后，在教育上所引起的效果是什么呢？那将是损害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而帮助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的所谓“物质文明”的迷信。

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计划，两种教本中都有所论述，这些论述往往不合实际情况，有的还包含了错误的认识。《开明》第二册第6页中，介绍了美帝国主义的专家萨凡奇的所谓“扬域安”计划，说那个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发多少电力，灌溉多少农田。实则，据有些科学家的批评，那个所谓计划完全是为美帝国主义

的利益做打算，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复兴》上册165页，中册34、35、39、45页，都提到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表示如按照那个计划在全国修铁路、筑港口，我国的建设将会大有希望。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他的虚心接受真理的态度，诚然值得我们佩服，但我们也要老实的指出，他的实业计划的许多论点却不是从实际出发的，因而也就不适合与今天伟大祖国建设的需要。

六、关于选用材料

这两种本国地理教本，在选用材料上都不够谨严，有的由于无批判的采用旧材料而承袭了旧的错误，有的由于没有随着形势的发展改换新材料而形成了错误。

《开明》第四册13页说：“清太祖起兵，锁阳首当其位，攻下后乃易名抚顺。”作者没有分析，清太祖把锁阳易名抚顺，是含有民族侵略的意义在内的。同书55页说：“尧都平壤，是现在的临汾；舜都蒲坂，是现在的永济；夏都安邑，是现在的运城。”作者没有考察，这儿所列举的尧、舜、禹的都城，都是缺乏真实性的。这个教本中，和一般教本一样，记载了不少的名胜古迹。第二册20页记载了成都外围薛涛井、青城山，万县城东的诸葛孔明八阵图，24页记载了峨眉山佛教圣地。第四册11页，记载了沈阳外围的清陵，58页记载了西安附近的雁塔、碑林、阿房宫等等，这些名胜古迹有的缺乏科学的可靠性，有的在记载的意义上含有士大夫“发思古之幽情”的不健康的气息。地理教本中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历史，但联系的标准首先应该是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与建设热忱。

《复兴高中本国地理》中保留了许多陈旧的材料。上册第二章关于生产，第三章关于交通，第四章关于省界，下册55页，关于东北的政区，材料与说明大都是陈腐的。上册177页关于国都的位置在正文内曾做了修改，但在习题内仍将南京当做首都来发问。学生在这些陈腐的材料与说明中，所认识到的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们不可能从这种地理教本中了解新中国的新面貌，人民的中国的新姿态。■

——原载1950年5月3日《人民日报》第5版

【文摘】

我初步认识了自己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

李德凤（师大女附中教员）

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中，我首先批判了我的单纯技术观点。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地学系学习时，几乎每天都要开夜车，把自己埋在书本和讲义中。图书馆几乎变成了我的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极为尖锐，我却站在斗争之外。我自以为是“好学之士”，主观地认为学校是学术研究机关，不应该有政治斗争。1946年，我转学到清华大学地学系。这时，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我是赞同罢课的，但是我不去游行。为什么呢？在罢课期间，我可以多看一些书。当游行队伍出发时，《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震撼了清华园，而我却躲在寝室里，对人民和国家的命运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1948年，我在大学毕业了。很快就参加了华北气象台的工作。我非常高兴，认为已经取得了努力读书的代价，并且得到了专门研究学术和技术的机会。解放后，有一个同志耐心地教育我，向我指出一个青年应走的道路，并介绍我参加学习。经过8个月的学习，我初步获得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知识。但我在批判自己的思想时，还一直认为在解放前，气象台的工作是“清高的”科学技术工作。后来经过党员同志的帮助和启发，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气象台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人民正在和蒋介石匪帮搏斗。气象台每天把天气预报发给陈纳德的航空大队，好让陈纳德的轰炸机轰炸解放区。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直接杀人的凶手，但我的工作无疑地是帮助了反动统治者。我的自鸣清高和自以为同政治无关，显然是不和事实的。现在，我在工作中，还是残存着单纯的技术观点。我对业务学习抓得很紧，经常找些业务方面的报纸、杂志、书籍来阅读；看不到或者没有时间看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安。而我的政治学习很差，我只是被动地去完成行政方面所给的任务。这样就使我的进步受到了阻碍。我一定要通过这次学习，彻底清算我的错误思想，努力改造自己，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原载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六版

【资 料】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天津延安中学是怎样复课闹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组训革命师生联合指挥部**

《人民日报》编者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光辉的“三·七”指示。¹今天，这所学校的革命师生，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复课闹革命中勇于实践、大胆创新，走在许多学校的前面。

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教育革命的最高纲领。

天津延安中学的革命师生，正是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旗帜和革命批判的旗帜，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批判，从而在改革教学思想、改革教学体制、改善师生关系、改革教学方法、改革教材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

毛主席在“抗大”校刊的题词中，曾经号召革命师生：“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英勇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师生，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发扬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在完成教育革命的伟大而豪迈的事业中，创造出一个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教育制度来。

天津延安中学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革命大联合以后，从三月一日正式复课闹革命。他们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最高纲领，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破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斗私批修，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人人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个个学习“老三篇”，班班召开

¹ 三·七指示，是毛泽东1967年3月7日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全文如下：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讲用会，学文，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个校园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教育革命的最高纲领

延安中学广大革命师生，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复课闹革命。大家感到：逐步转入以学为主的关键在于教育要革命。他们说：搞不搞教育革命，是关系到能否把学校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最高纲领，大破大立，边教学边改革，勇于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大家在学习中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光辉思想，最英明地指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大原则问题，是教育革命的指路明灯，是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必由之路。紧紧掌握这个纲领，是教育革命的关键。一定要把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高举革命批判旗帜，彻底摧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广大革命师生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投入了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掀起了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他们以亲身经历，揭发控诉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种种罪行。有的人揭发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分数挂帅的罪行。过去，在学校里流传着什么“分数万能”，“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子”，“考试是老师的法宝”等论调。学生们为了分数起早贪晚，钻在屋子里读死书，有的摧残了身体，有的成了近视眼。有的教师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考学生，与学生为敌。什么课堂提问、小测验、抽考、单元考、

阶段考、期末考、升学考……，一学期考来考去，把学生死死拴在书堆里不问政治。有的人揭发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和排斥工农子女的罪行。广大革命师生还揭发控诉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滔天罪行。例如，初中课本上一年只编毛主席著作二篇文章，还是“选修课”，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古人、洋人、死人的文章充斥课本。

在广泛揭发控诉的基础上，广大革命师生列罪状，梳辫子，抓要害，采用“三对照”“一挖根”的方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批判。

（一）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相对照：

（1）举什么旗？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却用资产阶级思想挂帅，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宣扬成名成家，追逐个人名利。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举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黑旗。

（2）走什么路？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中国赫鲁晓夫却说：“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的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一条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

（3）办什么学校？毛主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排斥党的领导，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校，拼命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黑货，抵制毛泽东思想，排斥工农子女，妄图把学校办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黑染缸。

（4）出什么人？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国的赫鲁晓夫却说：“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工程师”“县长”，“还可以当省委书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是，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脱离工农群众，“私”字当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和修正主义的苗子。

通过这一对照，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无比英明伟大，认识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恶本质以及中国赫鲁晓夫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二）用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相对照：

对照解放军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为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灌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的罪行。

对照解放军坚持林副主席提出的四个第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倡的业务第一、分数第一、智育第一、升学第一。

对照解放军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启发式的民主教学方法，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的苏修“凯洛夫教育学”，什么“注入式”“死读书”的教学方法。

对照解放军执行毛主席的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教学内容，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脱离实际，多而繁的教学内容。

对照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一心为公的雷锋、王杰、刘英俊、吕祥璧等英雄辈出，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私”字当头的修正主义苗子。

广大革命师生通过这一对照，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大家越比思想越明确，越比心里越亮堂，越比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越热爱，越比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越憎恨。

（三）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年多来的巨大收获，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相对照：

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大搞中国赫鲁晓夫的“闭门修养”，按照这一套来办，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个人主义越重。在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革命师生遵循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的教导，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懂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革命，以及革谁的命，怎样革命，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道理。通过亲身经历，回忆对比，革命师生更加认识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腐朽本质，更加坚定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信心和决心。

在“三对照”的基础上，革命师生又用“一事一批一挖根”的方法，进一步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过去，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为分数而教。分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学们作了深入的解剖：有了高分，教师就有了晋级加薪和评什么“教育专家”的资本；学生就有了步步登上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的指望。通过挖根，广大革命师生一致认识到：为分数的实质就是为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让学生为私而学，让教师为私而教。“私”字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核心。因此，要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必须狠斗“私”字。

敢字当头，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在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的基础上，革命师生遵循毛主席关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教导，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最高纲领，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精神，集中群众智慧。对旧教育制度做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

一、改革教学思想。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承了几千年来的旧教育思想的衣钵，死死抱住一个“私”字。针对这种情况，革命师生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首先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肃清其流毒。而后，又启发广大革命师生以“老三篇”为武器，向头脑中的“私”字开战，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开展群众性的斗私批修活动。广大革命师生纷纷摆问题，亮私心，查“上当”，挖根源，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初步树立了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的思想。

二、改革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是为教育思想服务的。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为了维护和适应旧的教育思想，搞了一大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不仅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而且加大了师生之间的隔阂。根据这种情况，革命师生就改革机构，建立了教师“跟班教学”的新的教育体制，以解放军为榜样，建立了政治处、文教处、后勤处。过去教师上课到课堂，下课回教研组，这样既脱离学生，又不便于抓学生的活思想，更不利于教师思想革命化。取消了教研组后，采取了两三个教师包一个班的办法，使教师以一个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学生之中，像解放军连队干部一样，

和同学们同革命，同学习，同劳动。这样做，有利于促进教师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抓活思想，有利于教学改革。

三、改善师生关系。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倡导的是“师道尊严”，造成了师生的严重对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加深了师生的隔阂。这是复课闹革命的一大障碍。改善师生关系也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我们在组织师生一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同时，还专门组织教师学习毛主席关于官兵一致的教导。通过学习，广大教师认识到：要改变师生关系，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感情，端正对同学的根本态度。这样，校内出现了师生之间政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教学上互补长短，生活上互相体贴的新的师生关系。

四、改革教学方法。

我们组织广大革命师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教育方法的语录，废止了“注入式”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开讲用会、讨论会等民主教学的方法，使课堂上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复课后第一堂政治课，讲的是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在讲课的过程中，同学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在讲《为人民服务》时，老师针对学生的活思想，不仅讲了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而且讲了许多革命先烈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可歌可泣的生动事迹，启发大家向英雄们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课后，同学们都说：这节课我们不仅学到了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毛泽东思想。有的说：上了八年学，没有听过这样好的课。过去大家一向认为数学课是纯知识课，用不上政治，现在教师用讲用会的形式，让学生结合下乡、下厂劳动，谈学数学的意义，使大家认识到，要掌握自然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我们还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请他们来讲家史、厂史、村史，请学生家长忆苦思甜，使学生经常受到活的阶级教育。我们还遵照毛主席“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导，彻底改变了旧的教学方法，变课堂上多少年来的“一言堂”为“群言堂”，出现了师生互教，教学相长的新局面。

五、改革教材。

革命师生们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政治课、语文课都讲毛主席著作。外语课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战时所需的对敌喊话等。一些知识课也都突出了毛泽东思想。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安排一定时间，让师生到工厂、农村，学工、学农；结合军训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

本文摘自黑龙江省教育革命联络站

《教学改革》第13期 1967年

【资料】

斗私批修 复课闹革命

哈尔滨市工程小学革命委员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以后，我校革命师生热烈响应，坚决照办。上个学期，二月二十四日就开始复课闹革命。这学期，十月十四日开学。复课闹革命的过程，是我们进一步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也是斗私、批修，不断促进思想革命化的过程。

以“斗私，批修”为纲，全面复课闹革命

为了积极贯彻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我们除规定教师每天一小时“天天读”时间外，还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边学习、边议论、边斗私，边讲用，武装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教师的头脑，促进了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全面复课闹革命。

复课的头等重要任务就是要上好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课。在上语录课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开始我们选了一些语录，领着学生只注重读和写，教师感到不好讲，学生也感到收获不大。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根据毛主席的教

导，我们认识到学习语录，必须和改造思想、参加社会斗争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在语录的选择上，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学生的活思想，有针对性的加以选择，有时也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基本观点，集中学习某一方面的论述，强调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由于这样做，毛主席语录学习收到了明显效果。各班经常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有时还召开全校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大大促进了师生的思想革命化。

上好革命大批判课，是复好毛泽东思想课，复好阶级斗争课，复好文化大革命课的基本内容。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就在每周两节的政治课中同学生一起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的罪行。同时，把每周的毛主席语录课，同大批判紧密结合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搞好大批判。我们还利用每周两节的辅导课加上每周集中一天的时间，专门组织学生开班或全校的声讨会、批判会。低年级的识字，高年级的作文，都同大批判结合起来。除了在校内组织学生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小字报、贴标语、画漫画、出墙报、排演文艺节目外，还组织学生到校外参加一些批判活动。形成人人动口，人人动笔，万炮齐轰中国赫鲁晓夫。革命大批判，使学生懂得了阶级斗争的道理，激发了学生对赫鲁晓夫的仇恨，更加热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激发了学生对旧社会的仇恨，更加热爱新社会。

一年级教师还根据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的精神，编写了三十五课教材。他们首先考虑对一年新生要进行热爱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便先教学生读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其次，选了一些易懂并和大批判有关的语录，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再次，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势编教材。如“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最后，他们也考虑到一年级还需要学一些常用字，便编了一些教给学生。

这学期，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发表以后，我们在前一学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全面复课闹革命。主要是搞“斗私，批修”，同时学些文化知识，搞点文体军训。现在高年级设有六节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政治课），三节语文，三节算术，一节常识，

两节革命歌曲，两节军体，一节劳动；中年级六节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四节语文，三节算术，一节常识，两节革命歌曲，一节军体，一节劳动；低年级五节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四节语文，四节算术，两节革命歌曲，一节图画，一节军体，一节劳动。目前，全校各班都按照这一安排进行复课闹革命。

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在封、资、修的教育思想影响下，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不平等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生就冲破了这种束缚，砸烂了旧的师生关系，大破了教师的“尊严”。因此，有的教师认为：“学生不服管了，动不动就造反，谁的话也不听了。”认为学生“太散、太乱”。由于“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学生的影响，在高年级学生中乱斗教师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这就造成了师生之间严重的对立情绪。由于这些问题，有的教师产生了畏难情绪，怕字当头。认为：“反正学生现在不好管，不定那一天挨斗，还是推着干吧。”因此，对学生发生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敢过问，怕捅了“马蜂窝”，片面强调“自己教育自己”。

为了解决教师的思想问题，我校燎原战斗队就组织全体教师，带着这些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学生和怎样对待学生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讨论和实践，大家一致感到，从表面看来，学生是“不服管了”，秩序比以前是“乱”了，但是，他们“乱”的是打碎旧的教育制度，不服的是封、资、修教育思想的管。这种乱是革命的乱。这个乱的过程是破旧立新的过程。

一年来，经过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学生更加热爱毛主席，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大破了陈规旧习，成为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小将，这是学生的主流和本质。对学生的缺点和错误，教师应负起教育者的责任。由于教师端正了对学生的看法，提高了信心和勇气，对学生中的问题，就不是躲躲闪闪，采取回避的态度了，而是敢于挺身而出，正视矛盾，正确解决问题。如五年六班有个学生，开始曾多次在上课的时间去找过去教过他的老师“算账”，说教师过去给他写的鉴定是黑材料，没收他的“玻璃球”和“瓦斯盖”是贪污行为。对于这些问题，教师一方面承认过去给他鉴定有片面性，看缺点多，一分为二不够；没收学生的“玻璃球”和“瓦斯盖”虽然动机是好的，但做法不好，公

开向他进行了检讨。另一方面，教师也敢于坚持真理，大胆指出他的错误。由于这样做，不仅消除了原来的对立情绪，而且这个学生对这位教师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教师现在虽然不教他，可他却经常找这位教师谈心。

建立革命的师生关系，教师既敢于当先生，又勇于做学生，向红小兵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又说：“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了，他们对于教师的缺点和错误，能够直截了当的提出。对待学生的批评，采取什么态度，也是对教师的一个严峻的考验。革命教师必须既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自觉地斗私、批修，敢于在学生面前亮思想，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学生一起大造封、资、修教育思想的反，大破师道尊严和旧的教师“权威”，大树同志式的教学相长的新的师生关系。因此，教师不仅能正确的对待来自学生的批评意见，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对于学生的问题，也能按照毛泽东思想正确引导，既不伤害学生的积极性，又要纠正学生的错误思想。

总之，由于教师能够破私立公，敢字当头，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和教育学生，师生间的对立情绪消除了，关系密切了，初步树立了革命师生是同志、是朋友的新的师生关系。

正确对待领导干部，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搞好复课闹革命，必须正确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在开始复课时，对我校的当权派如何安排，还没有正确解决。当时有人主张“让当权派扫地、扫厕所、烧炉子、当工友，让他劳动劳动，触触灵魂，没啥坏处。”我们针对这些反映，认真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六条”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引导大家用党的方针政策分析我校当权派问题的性质。

经过学习讨论，大多数群众认识到我校当权派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我们先安排他做班级的辅导工作。对这样的安排多数人是支持的，但也有的人认为是“过右了”，“是保了”。当时战斗队的领导核心听了这些反映，也感到压力很大，不敢再让领导干部做工作，更不敢把他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来，抱着消极拖延的态度。当权派也很消沉，认为“好好靠边站着，等候组织处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感到对复课闹革命不利。带着这些问题，在战斗队内开展了整风学习、辩论，明确了对革命领导干部，就是要大胆支持他们站起来革命，支持他们大胆抓工作，对他们的错误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敢于坚持原则，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政策办事。由于我们的认识提高了，在批判《修养》时，战斗队领导核心，多次找当权派谈话，帮助他认识过去受《修养》的毒害。在全校批判《修养》大会上，原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深刻地检查了过去受《修养》的毒害，批判了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们还多次组织干部亮相会，帮助领导干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

经过一段工作，我们确定把原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来，并让他当第一把手，原三名教导主任，结合了一个，担任副主任工作，其余两个也安排了工作。实践证明，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民兵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起来，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搞好复课闹革命的重要保证。■

本文摘自黑龙江省教育革命联络站

《教学改革》第13期 1967年

【资料】

教育部革联召开座谈会

讨论教改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革命战讯

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对当前教改问题进行一番调查，并召

开一次教改座谈会。会上大家谈到，目前教改工作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武器问题。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五·七”指示。许多人反映吃不透，理解不好。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我们进行教改的唯一指南和锐利武器，要搞好教改，头一条，必须把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好。

二、社会的斗批改与本单位斗批改的关系问题。有的学校关门搞斗批改，不注意进行社会调查；有的则相反。

三、批和改的关系问题。有人把批和改的关系对立起来，单纯考虑批或片面地急于改。有的由于急于改而堕入改良主义泥坑。

四、师生关系问题。有些教师不敢与同学合作，愿意教师自己组织班子。有的学生则看不起教师，一提教师就说：“不要走专家路线嘛！”

五、群众路线问题。现在教改只是在知识分子中转来转去，还未听取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呼声。

六、轰轰烈烈与扎扎实实的不关系问题。许多人不能坐下来冷静地考虑斗批改的问题。

七、有些人不注意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有些人虽作了调查研究，但对所得材料研究不够，因而批判水平不高。

八、在教改问题上，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革命小将的作用。否则是错误的。

九、样板问题。像京剧改革一样，树立样板，总结经验非常重要。如江西共大、黑龙江萌芽学校等等，应该好好总结。

十、总结经验问题。抗大的办学经验和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经验，应该好好总结。■

摘自《红色教育》

在教育战线占统治地位的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

目前，围绕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黑线占统治地位，理由是：①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从高教部到大部分基层单位，基本上由“走资派”把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二者勾结专了我们的政。②现在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方法、教材基本上是资、修的一

套。近几年的所谓教改（一九五八年除外），是在资、修方向不变的前提下的修修补补。③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大方向被否定了，老解放区和抗大教育制度被否定了。④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贯彻较少，修正主义的一套占了统治地位。⑤现在的教育制度仍不利于消灭“三大差别”，而有利于扩大“三大差别”；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破坏而不是巩固。⑥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前未形成高潮，受到严重破坏和扼杀。

另一种认为红线占统治地位，理由是：①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封锁不住，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形成。③广大干部和教师是好的或比较好的。⑤十七年来毕业生与解放前有本质区别，基本上适合社会主义需要，基本上能为工农兵服务。④招生比例工农子女占多数。⑤学习的政治空气较为浓厚。⑥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成绩是基本的。■

原载天津市《教学批判通讯》

讷河县团结中心校着手编写明年春季教材

讷河县团结公社中心校革命师生，在批判旧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先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和九月编写了本年度教材。十月十九日又在县文教组的领导下，开始了一九六八年春季使用教材的编写工作，预计十一月末脱稿。（通讯兵）■

本文摘自黑龙江省教育革命联络站

《教学改革》第13期 1967年

【以歌观史】

编者按：

为了配合本期的“狼奶讨论”，我们选用了两首歌曲。这两首歌在思想主题上贯穿着一条国人熟悉的“红线”——在控诉旧社会苦难，宣扬阶级仇恨的同时，念念不忘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德。请看这两首歌的歌词——

一、《想起往日苦》

湖北天门民歌，甘朝清编，湖北民间歌舞团 1965 年演唱

- 1、想起往日苦哎，两眼泪汪汪哎，家破那个人亡哪好凄凉，哎咳哟哎，哎咳穷人哪好心伤哪哎咳哟。
- 2、不怨我的爹哎，不怨我的娘哎，只恨那个地主呀黑心肠，哎咳哟哎，哎咳把我哪剥削光哪哎咳哟。
- 3、万恶蒋匪帮哎，抓丁又抢粮哎，一家那个老小哪难活命，哎咳哟哎，哎咳只好哪去逃荒哪哎咳哟。
- 4、落雪又下凌哎，阵阵北风狂哎，饥寒那个交迫哪倒路旁，哎咳哟哎，哎咳亲人哪哭断肠哪哎咳哟。
- 5、村村血和泪哎，处处是荒凉哎，三座那个大山哪头上压，哎咳哟哎，哎咳穷人哪盼解放哪哎咳哟。
- 6、地也哎黑沉沉呀，天也哪暗无光呀，旧社会的苦难哪诉不尽，我的姐妹们哪，哎咳仇恨哪永难忘呀哎咳哟。
- 7、红日出东方哎，来了共产党哎，来了共产党哎，丢掉手中讨米棍呀，衣哟呀喂哟哟，扛起哪红缨枪。
- 8、扛枪打游击哎，土改闹翻身哎，土改闹翻身哎，打倒地主反动派呀，衣哟呀喂哟哟，江山哪归人民。
- 9、人民掌政权哎，要把乾坤变哎，要把乾坤变哪，集体力量大无比呀，衣哟呀喂哟哟，创造哪新世界。
- 10、革命干劲大哎，生产跨骏马哎，生产跨骏马呀，三面红旗迎东风呀，衣哟呀喂哟哟，建设哪新国家。

11、我们翻了身哎，敌人不甘心哎，敌人不甘心哪，阶级仇恨牢记心呀，哟呀喂哟哟，永远干革命。阶级仇恨牢记心，永远干革命。

二、《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

胡松华词，阿拉坦仓、胡松华曲，胡松华 1964 年演唱

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晚风中传播着牧人的笑语，马头琴声四处飘荡。

公社一片丰收的景象，边防骑兵心花怒放，小队巡逻过河湾呐，我的心儿把往事回想。

想起了童年悲惨的时光，仇恨的烈火烧红了胸膛，王爷的快马拉死了我的爹娘，鞭子又逼的我到处流浪。

告别了我那苦难的家乡，热泪湿透了染血的衣裳，复仇的决心催动着骏马，奔向那红旗飘扬的远方。

用鲜血换来了草原的解放，幸福来自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雄鹰的翅膀，骄傲地飞向边疆。

一旦草原上再有恶狼作乱，定将它们全部埋葬，想起了草原上苦难的昨天，永远握紧刀枪。想起了草原上苦难的昨天，永远握紧我手中的刀枪。

文革前曾长期向青少年灌输阶级斗争教育，忠诚教育和仇恨教育。包括经常大量的政治学习，听报告，上团课，参观，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革命军人）做忆苦思甜和英雄事迹报告，访贫问苦、“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开展“四史”（村史、社史、厂史、家史）教育，下乡劳动，军训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还创作了大量配合这种教育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等文艺作品。其中煽动阶级仇恨、渲染地主剥削给下层民众造成苦难的歌曲，就是这种“狼奶”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不忘阶级苦》；《小曲好唱口难开》；《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等等。

有一首歌我只依稀记得几句歌词：“提起旧社会呀，恨的咬牙根，……贫农、下中农啊，压在最底层啊，世代做牛马啊，豺狼……”（歌曲的名字和作者都记

不清了，如哪位有心人记得，盼告）。在这样的一种政治化革命化教育氛围中，一些青少年学生开始形成日后红卫兵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无情被视为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念形成之后，他们便满怀对革命的渴望和“砸烂旧世界”的豪情壮志及建立“红彤彤”新世界的理想，顺理成章地走向了文革造反的前列。正是这种缺乏科学内容的仇恨教育，与忠诚盲从和个人迷信掺合在一起，除了培养“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地冷酷无情”之外，还驱使红卫兵们对“地富反坏右”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随本期同时发出的，还有一个音频文件。从这个文件里，可以听到上述两首歌曲。但听歌之前需要下载下列七种音影播放器软件中的一种：迅雷看看、射手影音、QQ 音影、搜狐音影、暴风影音、Media player、百度音乐。如果您的电脑中已经安装了上述播放器软件中的一种，则请点击播放（马昌海）■

【编读往来】**1、读者谈李南央之文**

以前只是通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知道李南央的大名，如今通过《记忆》对李南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是老三届中少见的好学深思、见解超群的人。这可能得益于她有李锐这样一个父亲。去年最后一期《记忆》上有一篇她的《从保尔与冬妮娅谈起——活法儿的自由》，我看了好几遍。她以亲身见闻讲出了一个道理：一个健康社会的价值观应该是多元的，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是人的基本权利。任何对这一权利的限制都是错误的。这是她13年前写的，之所以至今仍会打动我，是因为我们仍旧生活在一元之中——以前的一元是政治进步，现在的一元是事业成功。现在给中学生讲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说到底就是多挣钱、当大官、成名人。

——武昌 刘爱军

喜欢李南央的文章，原来以为她是“红二代”，读了她谈女十中的文章之后，才发现她还当过“黑五类”、“狗崽子”。这可能是她的思想见解超出一般的“红二代”的原因。她对中学教育的认识和分析，很生动也很透彻。希望读到她更多的文章。

——沈阳 解元春

2、李彤谈“狼奶讨论”

“狼奶讨论”用心很好，但希望不是炒冷饭。“狼奶”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这些年一直没断了说。如果贵刊想深入讨论，就得从根儿上说起。

3、编者声明

本期刊头所用罐头图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恳盼作者或知情人与本刊联系，俾便解决版权事宜。特此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